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3年7月30日第19期

本期目录

〔山西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石名岗 山西造反派的崛起与省委的分裂

蓦然回首

李 辅 在山西文革的“震中”——山西省委机关文革亲历

书海泛舟

孙 涛 《虔诚的疯狂》题记与目录

侯光天 《虔诚的疯狂》序1：历史的责任和作家的良心

董大中 《虔诚的疯狂》序2：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赵 瑜 《虔诚的疯狂》序3：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致孙涛兄

文摘

孙 涛 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

编读往来

李正权对上期何蜀文章的一处质疑与何蜀的答复

忻鼎亮来信谈何朴

〔山西文革专辑〕

说明：山西省是文革中一个很有特色的省份。1967年的“一月革命”，山西是第一个完成省一级夺权的地方，堪称“全国‘第一夺’”；夺权成功之后却内战不息且愈演愈烈，甚至在标志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中共“九大”之后还在炮火连天，致使新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特地为之发出措辞严厉的《布告》，为落实《布告》，山西夺权时的造反总指挥、工人造反派领袖杨承孝被枪毙以震慑群雄，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之一例；而自文革前即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使山西省的农民造反派代表陈永贵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凡此种种，都使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十分值得研究

的内容。令人欣慰的是，山西民间有一小批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默默耕耘，对该省文革历史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回顾与研究，已经写出颇有分量的著述。本期专辑即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编成，特此致谢！

【史林一叶】

山西造反派的崛起与省委的分裂

石名岗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中的山西文化大革命史稿。

作者石名岗，1948年生，山西翼城人，高级工程师。1968年山西轻工业学校工艺美术专业毕业，1983年太原机械职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曾任太原锅炉厂设计处、工艺处、标准处处长。退休后从事文革历史研究与写作。



风暴刮到太原城

山西古称河东——黄河之东。黄河之西是陕北，河东河西都是黄土高原。河西在上世纪20~40年代长期是中国共产党人闹革命的根据地；河东则从30年代后期开始，分别被八路军开辟成为三块抗日根据地。因此，当时同样贫困的河东、河西从来不乏革命传统和热情。

1966年6月1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毛泽东所说的“北京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即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传播到太原时，各大中学校立时就沸腾起来了。

6月3日，太原工学院（现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就出现了大量的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其中不乏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4日，山西省委党校、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现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等大专学校也掀起了写大字报的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6月6日，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当时省政府的名称）古式牌楼门口旁边的西面墙上，贴出了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现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革命造反派（即后来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冶校东方红公社）炮轰山西省委的大字报，题目是《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该大字报要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

这是山西省第一张炮轰省委的大字报。对于山西省委来说，这张大字报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省委把这张大字报的出现看作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派人拍照存档并把大字报刮掉消除影响。

山西省委确实与北京市委一样，因为他们同样不知道毛主席要干什么，采取

了与北京市委一样的办法和措施来应付即将（或已经）到来的这场风暴。

6月上旬，山西省委指示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或联络组（工作组的另一种形式，权力要小一些）进驻各大专院校。

6月10日，省委书记卫恒从北京打电话回省，指示各校成立大字报编委会以控制大字报的内容。

7月2日，省委书记卫恒指示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要摸一摸各类人，包括教授、讲师、各级领导干部、高中以上学生（主要是大学生）的思想动向、重点问题，要把问题多的单位的底子搞清楚，要排排队。”对于领导干部中“有的同志有问题，历史地看还是好的。要及时提醒，使他们有个精神准备。”对于贴大字报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捣乱的，情况异常复杂。”

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在向相关部门领导传达卫恒指示时，要求在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反四类人，并限令“抓紧时间完成”。一时间，不但许多贴大字报的教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许多平时被看作“落后”、“不听话”及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当时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达三分之一之多）。

8月13日，太原重机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到省委提出给“划为右派的师生平反、罢相关院领导官”等八项要求，希望省委给予重院造反派以支持。应该说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找省委解决问题，还是信任省委的。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粗暴地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并且指示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窦凯组织了许多机关干部，对重院学生进行围攻推搡。之后，还把革命造反小组的学生扣押到晚上才放回。这就是轰动全省的“八一三”事件。

8月16日，卫恒书记在太原湖滨会堂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继7月18日大会后，再次强调要大抓“伸手派”、“野心家”。

9月10日，在造反派的支持下，已经遭到省委批判并停职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贴出了题为《我的自辩书》的大字报为自己翻案。

9月11日，太原第五中学高三学生刘灏贴出了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这是山西第一张指控卫恒这位省委第一书记为“黑帮”，指控山西省为“黑线”的大字报。作者在大字报中还称赞袁振“站到革命派一边”，称其“同卫恒坚决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

9月12日，来山西进行革命大串联的北京工业学院七名学生来到省委，向卫恒书记提出：他在7月18日报告中大抓“伸手派”、“野心家”的说法是“方向性错误”，要求更正。卫恒承认有方向性错误，并承诺更正，但未见行动。

9月16日，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联合成立了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行动口号是“炮轰卫恒，支持袁振”。

9月19日，太原五中、太原工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刘灏、宋捷（太原工学院学生）的率领下，在山西省第一招待所，就袁振问题与卫恒进行辩论。辩论竟然进行了一个通宵。

在开始阶段，山西省委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是，山西省委一方

面抓袁振为首的“伸手派”、“野心家”，一方面在学校大抓“右派”、“反革命”，显然与毛主席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相违背，所以省委的优势在不断丧失。10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指出：“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紧急指示》还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紧急指示》一经公布，包括山西省委在内的各级党委顿时陷于被动。

造反派组织在风暴中崛起

除了各校的老红卫兵出现较早以外，从1966年8月开始，各校各类造反派组织（包括所谓“保皇派”或“保守派”组织）或其前身，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太原市因大专院校较少，许多中学红卫兵与大专院校红卫兵同样有名。

大多著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产生于著名的院校，这也许与这些学校的思想水平和人员素质有关。

山西省委党校一直是山西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摇篮，当时的副校长葛莱据说是“一分为三”哲学理论的创造者。虽说“一分为三”哲学理论在文革中被以“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理论”的罪名批判，但也说明了该学者有着独立的思想。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战斗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造反出来的，其领袖段立生就显得比其他的造反派领袖更睿智、理智和机智。段立生和省委党校东方红战斗队后来成为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灵魂，当然不是偶然的。

太原工学院源于1902年建立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的工学部，1953年独立建校，院长是山西资深教育家赵宗复（其父是同盟会元老、民国时期的两任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在这个学校竟然出现了山西三大造反派组织的三支骨干力量。以李青山、杨保明为首的太工红旗战斗队成为后来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主力；以宋捷为首的太工瑞金战斗队成为后来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主力；以高翔为首的太工永红战斗队先是红联站的成员、后来成为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主力。工科学生的思想强于文科，成为了文革中一种独特的现象。

山西大学本来就是山西省的第一学堂，副省长焦国鼐兼任其校长，可见其在山西的地位。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一直在社会上“独往独来”，在很晚的时候才加入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的对立面是“山大八一四战斗队”，是著名的保刘梅副校长的“保皇派”组织，后来却成为了红总站的主力。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当时是国内仅有的两所重型机械院校之一，也是山西省仅有的两所部属院校之一，当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理。由于是全国招生，可以说

是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可谓人才济济。重院造反派领袖张珉及他的重院联合总部的伙伴在文革后期惊世骇俗的行为（张珉后来质疑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死刑）即将证明这一点。

太原第五中学是一个英才辈出的学校，也是山西省第一所公办（官办）中学。它建立于1906年，名称是山西公立中学堂。民国后曾更名为山西省立模范中学堂、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中共山西省第一个党支部便诞生在这里。建国后更名为太原第五中学。上世纪60年代，太原五中是优秀学子和干部子弟云集之地，太原市最著名的中学造反派领袖刘灏及最著名的中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战斗队诞生在这里就毫不奇怪了。刘灏不像人们想像中“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派领袖，而像一介书生。刘灏属军干子弟，本与文革造反关系不大，据说是因为看不惯老师被揪斗而仗义造反，或者为同学的父亲（同学袁南征的父亲是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打抱不平而造反的。

太原第六中学（现进山中学）至今已有近九十年历史，民国时期是山西省著名私立中学太原进山中学校，首任校长和董事会总校董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据传当时只有各县考试前三名的学生才有资格进入进山中学，该校有思想活跃的传统，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曾任校长，是当时太原市共产党活动的中心。文革初期，该校李金渭、史纪礼等人也成为了太原市著名的造反派领袖，他们的战斗队叫“32111战斗队”。这个名字来自四川石油管理局的32111钻井队——该队因扑灭气田大火而被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是当时全国学习的英雄集体。

太原第十中学（现山西省实验中学，山西唯一一所直属省教育厅管理的省级重点中学、省示范高中）前身可追溯至1882年清末洋务运动著名领袖、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建的令德堂书院（令德学堂），学堂旧址即今天的解放路校区。1902年山西大学堂创建之前，令德堂书院是山西省的最高学府。1905年，令德堂书院更名为山西省师范学堂。1952年更名为太原女子中学。1955年更名为太原市第十中学。60年代的太原十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干部子弟多（校址在省政府西门对面），一个是农民子弟多（省内招生）。这样一来，学生思想的复杂性就多了一些。十中的学生领袖田仿余、马尚文、王忠强、王海军四人中，两个来自外地，一个出身普通职员，一个出身革命干部。运动开始时，四人都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只好奋起造反，成立了十中“七一战斗队”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七一”中的“红五类”组织）与老红卫兵对抗。省人委干部子弟王海军终因对待省委的态度分歧而另建了十中“子弟兵战斗队”，成为“七一”的对立面。

太原十五中当时是一所不太“起山”的学校，但是其学生造反派“十五中红旗”的领袖常理正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同情心，在同学中极有威望，为保护班主任而造反。常理正后来的非凡经历，确有一些传奇色彩，替太原十五中添了彩。

有一定影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还有许多，如太原十二中红旗、太原冶金工业学校东方红、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山大附中八一八、山西医学院红色革命造反者联盟、太原机械学院红旗、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山西农学院（位于太谷县）火炬战斗队、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位于榆次县）东方红兵团和八一八革命造反大队等等，只不过其领袖的社会影响力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们所淡忘。

各派群众组织联合作战

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一两个月之间，运动发展得如此迅猛，实际上连毛泽东也没有预见到。到1966年10月份，从校园开始的造反风暴，又开始飙向社会，飙向机关、工矿企业，飙向街道和农村。

如果你是过来人，肯定知道那个时期曾经广泛流行过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湘江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在那篇文章里毛泽东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须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当文革运动走向社会时，出现社会的联合就是必然的了。与省委作斗争的各校造反派红卫兵们，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毛泽东的这段话为理论依据，实行了自己的联合。

据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编写小组编写的《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10月26日 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已下达二十余天，卫王王（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大任，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作者）集团负隅顽抗，拒绝执行军委《紧急指示》不给（被划为右派、反革命的师生——作者）平反，为了迫使山西黑省委执行中央军委指示，于是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串联了太原十中‘七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省党校‘东方红’、山西医学院革命造反派（山医‘红革联’的前身）、太原冶金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队’（冶校‘东方红’的前身）、太原十二中‘东方红’和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等七个造反派组织，经过周密研究，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到省委造反，清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宣传车冲破警卫，开进省委，大造革命舆论，并揪出王大任当场辩论，揭发了省委拒不执行中央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革命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住凛凛寒风，不断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坚持斗争了十二个小时，打退了王大任的软磨硬抗，最后迫使王大任、武光汤（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作者）代表省委在五项协议上签了字。其中规定山西省委必须迅速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给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不准继续耍阴谋，放暗箭，转移销毁黑材料；并对迫害群众的干部层层追究，不得抵赖；给受迫害的群众赔情道歉等。同时迫使省委将此协议印发三万份，发至山西各地。当天晚上参加战斗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山西大中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后简称‘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根据当时太工红旗战斗队队长李青山在博客中的回忆，红联站是在 1966 年 11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他是这样说的：“十一月一日，太原红色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地点在大南门工人俱乐部(南宫)旁的省第二招待所(后为太原警备区驻地)。主要下属成员有：太工红旗，太工永红，山西省党校东方红，太原机械学院红旗(简称太机红旗)，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太原冶金学校东方红(简称冶校东方红)，太原十中七一，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简称会校井冈山)等，稍后又有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简称山农火炬)等大批组织加入。各主要战斗队至少派一位负责人作为该队联络员参加联络站工作。太工红旗的联络员是副队长杨保明；省党校是赵奋天(应为赵凤田——作者)、段立身(应为段立生——作者)；太机红旗是崔素花、顾喜贵；冶校东方红是孙发松等等。我队另有李仁武、王解新、葛金堂等作为工作人员常驻红联站。”

据十中“七一”马尚文回忆，红联站初次酝酿成立的时间是 10 月 25 日，地点是太原工学院电机系，省委党校东方红的赵凤田、段立生并未参加此次会议，党校东方红参会者是傅翼亭，太工红旗的参加者是李青山、杨保明及赵日昌。

至于为什么叫成“联络站”，李青山是这样说的：“我们设想，这个组织，不对各下属战斗队发号施令，而是遇到重大问题，召集各下属组织负责人开会讨论，协商决定。所以其名字不叫××兵团或××指挥部，而叫联络站。”

这种民主性是红联站与其他造反派的不同之处。根据原红联站成员的回忆，红联站的领导机构叫勤务站，成立时的总勤务员是杨保明。当时加入红联站的条件特别严格，必须是造反派组织才能加入，必要时还有调查。所以，用当时的语言来说，红联站是全省“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组织，许多人以加入红联站为荣。无疑，红联站成了全省最大的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1966 年 10 月 26 日，太原还诞生了一支名声赫赫的以中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据说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由 9 月 16 日建立的炮打黑省委临时指挥部演变而成的。兵团司令部被省委安排在省一招(山西省政府第一招待所)。当时参加兵团的主要组织有太原五中井冈山、六中 32111、七中 115 师(以八路军 115 师命名的造反派组织)、太工瑞金等。五中的刘灏被推举为司令，段建忠为政委(后因认识分歧退出)太工的宋捷为副司令(一说为政治委员)，主要成员有郭宏、李生权(五中)、李金渭、史纪礼(六中)、田大成(七中)、叶积凯、王清英(叶、王属山大八八红旗，但该组织未参加兵团)等。另外应该特别提到的兵团人物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机电科副科长汤建中。不知其是何时加入兵团的，却是兵团的“小诸葛”式的人物。此人极有头脑，被称为兵团的“高参”，对兵团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兵团的政治倾向与红联站相同点在于对卫恒和山西省委的态度，不同点在于对袁振的态度。在对待卫恒和省委的态度上，兵团和红联站都认为他们在文革初期犯了方向性错误。对于这个方向性错误，红联站的主攻方面是针对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将师生和普通干部划分为左、中、右、反四类，“挑动群众斗群众”(“十六条”语)，要求省委作出检查并交出、销毁整学生的黑

材料；兵团的主攻方向是针对省委转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所谓“伸手派”、“野心家”如袁振等，要求省委说明袁振问题，为袁振平反。在对待袁振的态度上，红联站自认为对袁振不了解，只是提出需要澄清袁振问题；兵团则是提出“支持袁振”的口号。由于有了袁振这位老政治家的支持，兵团的政治行为的老练度显然比红联站要强得多。

兵团和红联站作为山西省政治影响最大的两个造反派组织，其政治观点有过合合～分分～合合的过程。在1967年12月以后，兵团和红联站常被老百姓合称为“兵联站”，其领袖段立生、刘灏、宋捷常被人们联在一起称呼为“段刘宋”。

其实，山西当时还有一支影响很大、人数不多的学生造反派组织，这就是“首都红卫兵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简称“赴晋大队”。该组织最多时也就几十人，主要由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几个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清华井冈山、北工大东方红、北农机东方红等）的学生组成，也有非三司的如北航红旗（属首都二司）的人员参加。赴晋大队在山西文革前期的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批资反路线是由赴晋大队把火点起来的。从1966年11月13日开始，到17日，红联站在太原市的湖滨会堂（当时已改名“工农兵”会堂，相当于太原的“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北京学生介绍首都文化大革命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大会，对山西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赴晋大队与红联站的联系很密切，在文革中时常并肩作战。

在红联站、兵团及赴晋大队与省委作斗争之时，山西省的机关、工矿企业、街道及农村也开始了造反运动。很快，工人、市民及干部就走上了街头，走向了社会，投入了保省委和反省委的乱战。当时的省委、省人委门口和五一广场贴满了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到处是一团团、一堆堆辩论的人群，确实营造出一种“大革命”的气氛。

在省委方面，实际上早开始筹组自己的“御林军”。

8月20日，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欢呼“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并在大会上成立了跨校的山西红卫兵团和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红卫兵的总领袖是山大历史系学生刘普德。刘根红苗正，是省“学毛著积极分子”、省学联主席，自然是从骨子里拥护省委的。后来还有一支中学生的组织叫“百万雄师”，也是支持省委的“御林军”。

另一支“御林军”劲旅是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大约成立于10月份，比红联站、兵团稍早些。工联的领袖张志安是山西机床厂的一名年轻工人，也是小有名气的工人诗人。生活道路一帆风顺的张志安当然有理由与省委同呼吸共命运，他领导的“保皇军”工联与红卫兵团联手，多次阻碍造反派到省委造反，并冲击批判省委领导的大会。

在造反派方面，由于工人阶级的加入也声势浩大了许多。

10月19日，在太原市开始活跃着一支工人造反派组织，名称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这支队伍虽然进入社会比兵团和红联

站的骨干组织晚一些，但成立的时间却比兵团、红联站稍早。按老百姓的话来说，这个名称有点不太吉利，但这个名称确是对山西历史比较了解的人所起的。抗战初期，山西新军中有四个旅级单位的部队冠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的名称即源于此。开始的决死纵队由总部驻扎在太原的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和太原钢铁公司的造反派组织为主组成，随后，发展到了建筑、商业等企业，规模搞得很大。其领袖是十三冶的二级半电焊工杨承孝。年轻有为的杨承孝在山西的文革中有着笑剧般的经历。曾经叱咤风云，也有着悲剧般的结局，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1月8日，山西当时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成立，简称“工人兵团”。该组织主要由太原市的大型企业如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纺织厂、太原钢铁公司的革命造反派组成，其领袖是太重的工人张建国、李宝顺。随后，工人兵团在山西各地、县发展了下属组织，如工人兵团的大同军团、长治军团、忻县军团、中条山军团及介休军团等。在其全盛时期号称有五十多万人。

另外，还有两支由省委省人委干部为主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值得一提。

一支是“七一公社”，持红联站观点。其领袖是1964年从山西省委党校毕业的青年干部李辅。李辅当时在省委研究室工作，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被称为省委领导的“笔杆子”。作为“笔杆子”的李辅经常接近省委领导，这些领导及家属的腐败及霸道作风让李辅特别看不惯。比如说：华北局在晋祠宾馆开会时每天大吃大喝（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夜间补餐也不过是两个馒头片、一碟咸菜，京西宾馆年度招待费用不过十六万元）。又比如：省长王谦的夫人吃饺子竟然不吃包饺子时人手捏的边，嫌脏，吃馍不吃皮，而且对人特别霸道。省委领导的这些行为，导致了李辅的厌恶和反抗。

另一支是“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该组织开始时有“保皇”嫌疑，后成为造反派夺权的主力之一。其领袖是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黄锐庵，当时在省人委办公厅工作。

山西省委遭到内外夹攻

造反派的大规模攻势从三干会开始。

太原晋祠，原为晋王祠，始建于北魏时期，坐落在距太原市区25公里的悬瓮山下，风景秀丽。晋祠宾馆当时是山西唯一的豪华宾馆，曾接待过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1966年11月1日，山西省委按中共中央指示，在晋祠宾馆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部署文化大革命事宜。在这么好的地方开会，本应心情愉快而舒畅，但面对肃杀之气日益浓重的“政治深秋”和即将到来的“政治严冬”，面对正在形成势力的造反派，省委领导实在是高兴不起来。按红联站所编的《大事记》所述：“山西省委违背中央指示，把三干会开成了‘三推会’，拒不交卫恒七月十八日报告（即揪‘伸手派’、‘野心家’的报告——作者），拒不撤销工作组，并变本加厉地把一些工作组组长变成

了所派单位的负责人，继续镇压革命群众（把派到市委的工作组组长贾俊变成市委第一书记就是典型代表），甚至跑到‘世外桃源’晋祠躲避革命群众的监督，在三干会上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广大干部”。鉴于这种对三干会的看法，造反派开始造三干会的反。

11月3日，红联站的太工红旗第一个到三干会造反。李青山在博客中是这样回忆的：“就在这一天(十一月三日)，我们得知省委正在晋祠宾馆开三干会，认为是向广大干部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我们与省委签定的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的五条协议的好机会，立即于下午开着我们的宣传车赶到晋祠宾馆三干会会场，希望利用他们吃饭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要求遭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的拒绝。很显然，已经被文革搞得焦头烂额的他们不想让我们在三干会上再火上浇油。我们据理力争，史纪言、卫恒被问得无言以对，却仍坚持不准我们宣传。我们也不退让。斗争一直到次晨四时。红联站闻知我们在晋祠受阻，立即联络太原冶校、太原十中、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十三中等下属组织派人分四批前来增援。我太工红旗调来了录音机在辩论现场录音。同学们高唱战歌，高声齐读毛主席语录，斗志昂扬，表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对三干会震动很大。有一个穿黄呢大衣的干部甚至跑到我们宣传车前，鼓励我们斗争，并指出要讲究策略，提‘以卫恒为首的一小撮’，不要提整个省委。”“卫恒、史纪言等人没有料到我们会在现场录音，心里紧张，被我们问得十分狼狈，但态度生硬。同学们坚持斗争直到深夜四点多钟，卫恒才被迫答应次日立即组织人员处理黑材料，考虑交出七月十八日的黑报告录音，保证不销毁和篡改七月十八日的黑报告录音。我们认为至此，他们的面目已暴露无遗，没有必要再耗下去。我们将利用录音，大字报、宣传车将它公之于众，把群众动员起来。”“四日晨五时，我们大队人马返回。”

11月7日和8日，太工红旗在太原五一广场广播与省领导的辩论录音，鼓动群众造省委的反，听者甚众。

11月8日，兵团、赴晋大队和刚成立的工人兵团数百人，由兵团司令刘灏率领到三干会造反。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华夏文摘增刊51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48期及华夏文摘增刊51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51期连载，2006年7月24日、8月6日）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11月2日至19日山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造反组织要求解散会议秘书处，另立秘书处。同月8日，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和当天刚成立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共数百人将卫恒拉至山西省第一招待所进行辩论，然后要他们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八项要求是：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二、交出整群众的所谓黑材料；三、造反组织召开的批判大会，卫恒必须随叫随到；四、宣布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五、撤销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没有卫恒的“卫恒”（意指卫恒的代理人——作者）；六、为被整的群众彻底平反；七、广播

车应由造反派调用；八、各造反兵团在省委设立联络站。对此，卫恒给出六点答复：一、对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二、迅速地积极地为被整的群众平反；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材料不能给；四、11日以前撤出派驻太原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贾俊除外；五、要求撤销贾俊职务由省委研究，10日前再给答复；六、录音机去购买，时间不能马上定。他们还要求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大会，与卫恒在大会上‘辩论袁振问题’，让参加三千会的人员参加。并要卫恒在为此事已经拟好的《海报》草稿上签字。9日凌晨卫恒签字。稍后，省委有的领导人对卫恒提出批评，指出在《海报》草稿上签字是错误的。卫恒随即于10日发表《关于十一月九日〈海报〉声明》，称：‘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定《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

11月9日，红联站发动了第二次到三千会的造反行动，参加行动的有红色造反联络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五百多名学生。由于第一书记卫恒不在，当时由王大任书记出面接待学生。据李青山回忆，造反的学生们提出了六点要求：

- 1) 卫恒等人必须彻底交待自己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罪行，立即严惩迫害革命学生的凶手；
- 2) 卫恒必须撤走以贾俊为首的驻太原市委工作组；
- 3) 省委必须立即惩处拒不执行中央批转的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多次欺骗革命学生的首要分子王大任、李明温。罢李明温的官，令王大任当众作检查；
- 4) 省委必须令卫恒立即交出七月十八日的黑报告录音；
- 5) 必须立即澄清袁振问题；
- 6) 必须有革命学生参加（意思是仿效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邀请学生领袖参加三千会——作者）；

王大任书记当然不可能当场作出令学生满意的答复，学生们只好宣布造反，开始到各个房间去贴大字报，于是到处出现了一组组学生与三千会干部辩论的情况。到下午6时半，整个三千会终被学生们“挟持”到太原召开。

11月10日下午，兵团、赴晋大队在太原五一广场召集大会，就“袁振问题”与省委第一书记进行辩论。据李青山回忆，辩论的主题是“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该辩论主题选的很不妥当，袁振是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自然是党内问题，如果袁振是市长，还勉强可以说是党外问题，问题在于文革的主题就是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所以说辩题有点跑题。实际上卫恒书记说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并没有错，其错在于毛主席当时就是要把党内问题拿在党外解决，而卫恒书记没有理解他的主席的意图。

有当时参会人员估计，到会者至少有十几万人。之所以能聚集如此多的群众，一是因为太原人感到稀罕，从来没见过省委第一书记这样的高官与群众辩论（源于中国人少见多怪，其实外国总统经常参加广播电视辩论）；二是因为实力强大的工联和红卫兵团为了保护省委书记发动了许多群众到会。卫恒一到场，在场的

兵团小将中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打倒土皇帝卫恒，解放全山西！”“炮轰黑省委！”这种场合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批斗。或许是因为兵团小将动作粗野，使得群众反感；或许是因为卫恒的态度可怜，博得群众同情。反正会议没有进行多久，主席台下一片大乱，“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工联主席张志安跳上主席台，夺过麦克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卫恒见到此状，深怕违背中央指示挑起“群众斗群众”，连忙挣脱扭住其双臂的兵团小将，大喊：“同志们，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卫恒的这一举动颇有电影《英雄儿女》王成之风范，使他的支持者的情绪更加激昂。最终，张志安和工联的群众趁乱将卫恒劫走，辩论大会不得不中止。大会虽然中止了，人群并没有散去，兵团的学生们和工联工人群众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了夜间9点左右。

11月14日，红联站第三次到三干会造反，结果遭到“冷遇”。省委采取了挂“免战牌”的战术，主要领导没有出面，指派了个别领导支支吾吾地应付学生。造反派学生没有什么收获。19日，红联站和赴晋大队接管了三干会，成立了新的秘书处。省委组织的三干会实在开不下去了，随即被迫解散。

11月20日，红联站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了“控诉以卫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滔天罪行”大会。李青山回忆说：“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一则口号的提出正符合广大革命同志的心愿，一则有几个同志的发言确实很感人。特别是王玉花在发言中诉说了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后，几乎所有听会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尽管北风劲吹，寒风刺骨，来开会的人站在会场上，纹丝不动。”“开会中间，卫恒被拉到会场。受迫害的群众怒不可遏，高喊口号，要他站起来，要他低头。”李青山回忆中说：

大会最后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向全国通电。全国通电向山西省委提出七项要求，让省委明日10时前答复。这七项要求是：

- 1) 立即撤走以贾俊为首的太原市委工作组；
- 2) 立即解放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立即惩办迫害革命同志的凶手；
- 3) 立即处理拒不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欺骗革命学生的王大任、李明温。罢李明温的官，令王大任当众作检查；
- 4) 立即令卫恒交出7月18日黑报告录音；
- 5) 立即交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指示、通知、黑材料；
- 6) 将我们所提供的大会的材料发表于报；
- 7) 以上各项，如不答复，以有意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论处。

11月27日，兵团、决死纵队、山大八八红旗在太原五一广场举行批斗卫王王大会，这是山西文革历史上，或许也是全国文革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揪斗省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由于有了决死纵队这支工人劲旅的参加，上次卫恒被“劫走”一幕再未重演。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红联站和兵团的下属几个主要组织进驻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开始与省市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时叫“拼刺刀”）。并且多次在五一广场召开批斗卫王王大会。

12月29日，赴晋大队和红联站把前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揪回太原批斗。由于大势所趋，连工联、红卫兵团这样的组织也被迫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至此，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基本完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进入了“十六条”所说的“斗、批、改”的“斗”的阶段。

山西省委的第一次分裂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处境。“向左转”，他必然要背叛他所在的阶层，遭到省委主要成员的集体反对；“向右转”，他就必然要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遭到“灭顶之灾”。

山西省委的第一次分裂看来是源于第一书记对造反派的一次小小的妥协。

《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对这次分裂是这样叙述的：“11月20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等组织的几十人，再次找到卫恒进行‘辩论’，长达17个小时。强烈要求卫恒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后改为‘八项协议’）上签字。卫恒最终签字。此举可以理解为特定条件的非常之事，因为当时有个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虽然华北局指出签字是错误的，但在群众压力下卫恒当时不能不签字。值得注意的是，省委的少数常委竟以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鼎、史纪言等八人名义，于22日联名给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李雪峰写报告，称‘卫恒同学生签署的八项协议有许多是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并建议撤换卫恒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种撇开省委第一书记和多数常委，联名写报告的行为实属罕见，实际上是在卫恒的背后捅了一刀！这一点恐怕当事人在那时似乎也有感觉，所以在当日即1966年11月22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以八人联合报告作为省委正式报告，使之合法化。”“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到会的常委14人，除上述8位常委参加外，卫恒和其他5名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批评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会议决定：一、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以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省委常委理应团结一致应对混乱局面。但是却对卫恒的签字横加指责，实属一个失误。”

本来在造反派的协议上签个字也没什么，一是在革命的动乱时期逼供信的条件下签字，可以不认账不作数；二是签字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签字是违背中央指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当时中央都没了组织原则，提倡群众造反，基层还要什么组织原则，岂不是强人所难？所以签字并非大错，甚至就不是错。如果人们还记得的话，在10月26日，王大任、武光汤曾经代表

省委在太工红旗等七个造反派组织的五项协议上签过字。之后，省委既没有批评是“严重的组织错误”，也没有指责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显然省委在同样性质的问题上采用了两个判别标准。

事情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山西省委中太行派和太岳派的矛盾，卫恒和王谦的矛盾，早已为人们所知。联名给中央写信的八名常委中，有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贾俊、赵雨亭（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史纪言（省委常委、秘书长）等六人是太行派干部，郑林是晋绥干部，焦国鼎是晋察冀干部，可见这八人与太岳干部泾渭分明。王谦时年 49 岁，比卫恒小两岁，在省级干部中属于年少气盛的角色。从职位来看，是太行派的领袖，当是八人报告的发起者和策划者。

“少数常委”当是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贾俊等四人，其他人可能属于被迫接受既成事实。对于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卫恒，八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无异于落井下石。当时省委干部中流传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某次省委常委会上，已被造反派搞得精疲力竭的第一书记卫恒有辞去第一书记的愿望。王谦在会上态度强硬地说：“你死也得死在第一书记的位置上！”

另一件事是卫恒阑尾炎手术后身体不好，为了躲避造反派的追逼，藏在省委机要室休息。此事只有王谦和史纪言知道，并握有钥匙。但造反派却在机要室找到了卫恒。

山西省委的第一次分裂就这样发生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当时的造反派还是把“卫、王、王”看作一体的。

山西省委的第二次分裂

山西省委中原先就有两部分不得势的干部，一部分是袁振这样的外来干部，另一部分是被贬到山西的干部。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可能就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在明面上，袁振是第一个跳出来公开与山西省委作对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结果连累陈守中等人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可见袁振是省委中的“另类”。不管当时山西省委把袁振打成“伸手派”、“野心家”对还是不对（其实哪一个“政客”或政治家能不是野心家？），没有两、三个月，山西省委受到了十倍的“报复”，袁振幕后支持的兵团把省委折腾了一个焦头烂额。

在暗地里，副省长刘格平、刘贯一也在“蠢蠢欲动”。

刘格平，1904 年生，回族人。1922 年参加革命，有很老的资格，也有很倔的性格。1934 年 4 月，在领导河北省庆云县罢河工斗争中被捕入狱，押于北京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 年春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为了增强抗日力量，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在请示党中央批准后，决定狱中党员履行国民政府规定的手续（即在《反省声明书》上签字）后出狱。1936 年 8 月到 1937 年 3 月，包括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在内的六十一位党员，按党的指示履行手续后分批出狱，这些党员在出狱后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刘格平在狱中却拒不执行组织决定，一直到 1944

年才刑满释放，错过了为抗日出力的机会，其性格之倔可见一斑。建国后，刘格平被定为行政三级，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8年初，刘格平受党中央派遣，到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工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上，刘格平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政府主席。1960年，宁夏搞了一场所谓的“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据传刘格平与自治区党委书记汪峰因民族服饰问题（如果真是因为此问题产生矛盾，几乎有点可笑）发生矛盾，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进行了数个月的批判后撤职调离，到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刘格平被贬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

刘贯一，1908年生，1925年参加革命，资格也很老，知识分子型干部。建国前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高级敌工工作。建国后被定为行政五级，曾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59年不知何因（估计是有右倾言论）下放至北京机械厂任厂长。1963年贬至山西省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

刘格平、刘贯一有着相同的命运，如果他们能安于现状，安于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副省长职位的话，那他们的后半生应该是安逸而舒坦的。而刘格平偏偏不安于现状，开始与其他几位对省委有看法的省领导进行了串联，密谋造省委的反。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也许是列宁说的，也许是古希腊“特洛伊木马”故事的启迪。山西省委这个坚固的堡垒确实是被从内部攻破的。

【蓦然回首】

在山西文革的“震中”

——山西省委机关文革亲历

李 辅



作者简介：李辅，1939年4月出生于山西应县。从山西太谷农校、山西农学院专科部毕业后，1960年3月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习。1964年7月毕业分配到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先后在政治研究室、省委农村社教总指挥部、四清办公室工作。1967年2月担任山西省委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负责人。3月选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1970年7月下放到阳曲县辛庄，任辛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71年4月选为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6月调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11月任副主任。1973年12月任中共襄汾县委书记。1974年12月兼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1977年8月被打成“‘四人帮’在襄汾代理人”。1981年4月平反。8月任中共平遥县委第一副书记，12月任书记。1984

年1月免职，调晋中行署办公室，8月被打成“三种人”开除党籍。1985年到榆次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

文革产生有背景，卷入文革有原因。文革十年路，走得很坎坷。我一心紧跟毛主席，跟着跟着就错了。“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罪的。”

文革中，我当过几个月造反派头头，使我吃尽了苦头，被打、被斗、坐“喷气式”、游街示众、关地下监狱……以致影响了我一生。

其实，文革中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日子都不好过。

如今的青年，不知道文革。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说不清楚文革。我把在山西省委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历写出来，供大家了解和研究参考。

研究室出了“反党”言论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从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毕业分配到中共山西省委机关工作。八月，山西省委政治研究室开始组建。负责研究室日常工作的是由太原市委宣传部调来的王挺。成员有从省委宣传部调来的文自勳，山西教育学院调来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曲润海，山大政治系毕业分配来的赵凤翔、范守同、郭步台，党校毕业分配来的李春如、李家香、蹇仕明、赵稚聚、雷忠勤、张嘉滨、武正国和我，共十四人。研究室主任由省委党校校长李慰兼任，我们办公地址就安排在党校。

一个月以后，武正国调出给省长卫恒当了秘书；雷忠勤给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当了秘书；郭步台给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当了秘书。

研究室工作开始是按领导布置写批判文章。给我分配的是批判“鼓吹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的一本书，从书里搜寻“错误”。我看得很费劲，也很难找出明显错误的词句，觉得特别乏味。现在连书名都忘记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的一天下午，党校传达中央文件，是有关“四清”运动的情况。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试点。她化了名，深入到基层，说农村阶级斗争如何严重，解放十几年了，村里好像敌占区，干部如何与他们工作队斗争，村里特务遍地，跟踪盯梢，工作队和贫下中农根子秘密来往，暗地活动，工作队员不敢用真名，都改用化名。

我生长在农村，对农村现状基本了解。我们刚从“四清”第一线回来，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党校学生去祁县搞了一年“四清”试点工作，根本未见过王光美所说的情况。回想王光美这几年跟上刘少奇出国，穿着打扮时髦，风头出尽，早有不满意。听传达的时候心里就接受不了，认为说的太玄乎、太夸张了！那里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都成了问题！心里不满。晚饭后李春如、赵稚聚、李家香和我在一起随便议论，说了些对王光美“四清”试点经验反感的话。我还说了一句：“光美、光美、光有个美，她还有什么？”

没几天，张天林（省委党校副校长）找我们谈话，说我们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泄对王光美的不满，是反对党中央，反党的言论。嗨，原来是有人打了小

报告！不久，张天林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严肃批判，上纲上线，把一个简单的事弄得乌烟瘴气。李春如可能说得更多，是重点。我们每天写检讨，作检查，可是内心并不服气。

闹腾了好一阵子，到了十一月，省委下令政研室全部到洪洞参加山西社教总指挥部的工作。说是李春如错误严重，继续留在党校反省。

在社教总指挥部简报组

山西社教总指挥部设在洪洞县城牛站街一个独立的大院。我被分配到简报组，艾炜是我们的组长。组员有军区的姚远、电台的原野、政研室的李家香和我。

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是全省“四清”的总指挥，就住在总指挥部机关院内。他的工作习惯是晚上工作到两、三点，上午十点多起床。然后活动、洗漱、吃早饭。据说这也是毛主席的作息习惯。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陶书记的工作特别紧张，经常是通宵工作，每天下午，都约一些人谈话，后来起草了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检查报告。当时指挥部有一个小型印刷厂，排印陶书记的检查报告。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对形势估计和对基层干部的认识方面的错误。这关系到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四清”运动的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就是在王光美“桃园经验”的基础上起草的。在这个文件的影响下，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片，把他们集中起来“洗手洗澡”，轮番批斗，封闭隔离，专案审查。在洪洞工作团召开的三干会上，好多参会人员，天还不冷就穿着大棉袄，随时准备对付刑讯逼供。有少数基层干部在重压下熬不过去，自杀身亡。

不久，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肯定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纠正运动中左的错误。洪洞“四清”工作专案组隔离审查的基层干部，获得解放和自由。

一九六五年元宵节过后，“四清”工作团政委会议在临汾宾馆召开。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贯彻“二十三条”，如何正确对待基层干部。省长卫恒在定襄蹲点，提出了“换心不换人”的口号。关键是解决好干部的思想问题，使其转变错误立场。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主要是作会议记录。会议要写纪要，我就跑印刷厂送清样。就是在那次会议，我领略了陶鲁笏书记认真的工作态度。一个“纪要”，一遍一遍地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抠，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改就是深更半夜，有时甚至是通宵。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从那次会议开始，“四清”办公室主任刘贯文带着艾炜，艾炜又带着我，每逢召开政委会，必然是我们三个人上会。

开会是一种特殊享受。说是一元钱的伙食费，其实不论到哪里开会，地方都要补贴，千方百计让省里的头头们吃好，喝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喝了茅台酒，在那时，这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到的。

有一次四清政委会议在晋祠宾馆召开。省委常委都参加了。那次会议使我看到省里要员们的风采。王谦的博学、健谈；卫恒的谦虚、和蔼；王大任的睿智、

平易；刘开基的直爽、开朗……真是各有千秋。

记忆最深的是常委会讨论到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能不能拥有小平车？当时议论如果某社员有一辆小平车，拉土、运肥的效率，就是人挑、肩扛的几倍，工分就多赚几倍，这样就会形成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参加会议的要员们，举出了生产队许多实例，从理论上进行多侧面的阐述，认为社员拥有小平车，会引起两极分化，最后还是决定：社员个人不能拥有小平车。

现在听起来这好像是笑话。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一个“笑话”，要省委常委讨论，最后得出让人笑不出来的结论。

晋祠会议使我想到“修正主义”

一九六五年五月份，“四清”总指挥部从洪洞撤离。指挥部机关也改为“四清”办公室。回到省委大院办公。

回到太原不久，华北局在晋祠宾馆举办读书会，各省（市、区）书记处书记全部参加。同时又在太原举行华北地区现代戏会演。

在此期间，山西省委又在晋祠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又让我上会为地委书记们服务。

晋祠距太原二十多公里，在悬瓮山下，难老泉旁，北魏前建祠，有规模宏大的圣母殿，殿内有四十三尊宋代彩塑，殿前鱼沼飞梁设计奇巧，建筑精美，为国内仅有。周柏、隋槐、苍劲葱郁，御碑石刻，稀世珍书。晋泉顺湾绕流，绿柳沿岸，松枝如虬，亭台楼阁，庙堂殿宇，相间其中，各色琉璃砖瓦，在阳光照耀下辉映，五光十色，斑斓夺目。自古以来就有官僚、巨贾、绅士、名流在此处修建别墅，尽享优美风光。

一九五八年开始，山西省委斥巨资在此风水宝地独辟一域，修建晋祠宾馆，说是为了迎接毛主席。一号楼是根据毛泽东的起居习惯专门设计、修建的。一个特点是洗手间特别大，而且能采光。因为毛泽东习惯性便秘，蹲厕时间较长，要在厕所内看书，因此要求屋大光亮。

依据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数额，又专修了二、三、六号楼。依据身份规格不同，各有特点。五号楼是主体楼，规模较大，住人较多，有礼堂，可以开大会。晋泉流经院内，依山傍水，各式别致的幢幢小楼，散布山丘渠旁。毛泽东喜欢游泳，专门修了室内游泳馆，叫四号楼。但自从建起晋祠宾馆，毛泽东也没来过山西，所以此馆就成为接待中央其他领导和高级别会议的地方。

当时华北局分管北京、河北、天津、内蒙和山西五个省、市、自治区，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

在当时林彪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大演现代戏的大背景下，李雪峰也想表现“紧跟”的姿态，所以举办“读书会”和“现代戏会演”。各省（市、区）书记大多数都到了晋祠宾馆参加读书会。读书主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白天读书学习，晚饭后到太原市区看现代戏会演。北京京剧界的许多名角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李世济等，都纷纷前来献演。我第一次看那么多艺术大家的精

彩表演。城里演的是现代戏，晋祠宾馆五号楼礼堂天天演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古装戏。李雪峰等高级领导，除参加一些重要场次（比如开幕式）外，并不观摩现代戏，而是在晋祠宾馆看旧戏。看完以后各省的头头们并不休息，通宵达旦玩麻将牌。读书、学习“毛选”，其实只是个旗号。

文化精神生活如此。物质生活更是奢侈。山西地委书记们在南楼吃饭。一天一元钱的伙食费。吃上几天，猪、牛、羊肉已经吃腻了，每顿饭都是鸡、鱼、鸭。主食不想吃包子、饺子了，最想吃的是绿豆面压饅饅、浇葱花香油汤。晋祠宾馆每栋楼都自设厨房，能够单独开伙。李雪峰住在一号楼，据说每天是五元的伙食费，吃的是山珍海味、鱿鱼海参。读书会有时交流心得，开会是在五号楼二、三楼大会议室。那个时代没有空调，李雪峰对电扇过敏，天热降暑，就在会议室四角放置冰块降温。

他们的言论、行动，对照毛主席那时签发的党中央关于禁止高级干部“玩物丧志”，警惕产生修正主义的文件、指示，我内心深处觉得，李雪峰这些人对毛主席并不忠诚。他们对封建文化的迷恋，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批的“修正主义”。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成长起来的干部，看到那样花天酒地的生活，再想想农民连棒子面都吃不饱的现实，内心产生了“反对”的萌芽。

晋祠宾馆游泳馆，二十四小时开放，消毒、净化、加热三大系统日夜循环。我在白天有空的时候，就去游泳馆游泳。有时碰上李雪峰的老婆，别人游，她就不游，她不愿和别人下水同游。这更激起我对官太太的厌恶。

总之，那时对党的高级干部，由原来的迷信，认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怀疑，怀疑有些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搞修正主义。

读书会开了五十多天，我在晋祠享受了三、四十天，那真是人间天堂啊！

一九六五年夏，中央决定调陶鲁笏到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兼国家经委副主任（主任是薄一波）。谁来接任山西第一把手？按惯例应该第二书记王谦接任，那时在山西搞“四清”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经过与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谈话征求意见，多数干部支持群众关系好、作风民主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卫恒担任第一书记。中央最后决定卫恒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

一九六五年秋，山西省委又提拔晋南地委书记赵雨亭、省委农工部长贾俊、副省长武光汤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调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袁振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秋末冬初，第二批“四清”运动开始，赵雨亭书记分管“四清”运动。“四清”办公室也扩充了队伍。我们简报组又增加了李天寿、郝玉生、任志浩等同志。工作基本机关化，正常上下班，加班也不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文件是关于处理“反党分子”罗瑞卿的决定。文件中罗列了罗瑞卿对林彪不满的一些言行，指出罗瑞卿有

野心、想篡权，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这一文件，对党内有很大的震动，许多同志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但说不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风波。

一九六六年过了正月十五，省委书记赵雨亭要下乡调查“四清”情况，“四清”办公室抽调我随同赵雨亭下乡。到了洪洞、侯马、曲沃，最后又返回临汾。赵雨亭一路上倾听各地的汇报，详细调查了解下情，又在临汾召开劳模座谈会，研究抗旱的措施。赵雨亭虚心了解下情，在全面调查基础上高度概括的能力，以及和他一起修改文稿，他能够不断征求意见，吸纳正确意见的民主作风，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对我的工作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内心深处，我敬佩这样的领导干部。

四月，就发动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许多劳模、知名人士都纷纷表态批判“三家村”。调子越唱越高，人们摸不着头脑。

五月十六日早上，按习惯起床外出活动，突然从高音喇叭里传出《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广播员严厉的声音，充满火药味的语言，矛头直指北京市委。文章中说“三家村的问题保不住了”，“谁指使你们玩弄那一套‘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而且声称要打击“一切已出笼的，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这已经说明一场政治运动将要开始了。听了以后，脑袋发炸，不知是凶是吉，忧虑重重。刘贯文也没有心思再调查研究了，草草结束行程就赶回了太原。

学校毕业后的两年，参加了“四清”运动，耳闻、目睹，也亲自体验到了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与高级领导人的接触，既学到了他们的优点，也初步了解了高层政治的复杂。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行走？是自己决定，还是社会决定？这时，我还回答不上来。

省委揪出“反党分子”

山西省委机关大院并不气派。在太原府东街有一个简陋的大门，四根砧柱抹上水泥，安了个角铁和钢筋焊成的栅式大门，像个一般企业，只多了个荷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大门两边各有两间平房，东边是传达室，西边是收发室。大门后边是照壁，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红漆大字。办公大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苏联专家帮助建造的，地面四层，灰色，有坚固的地下室，既不高大也不豪华，当时注重防空。大院东北有一座五层红楼，红砖到顶，面目平常，由纪委监委、统战部、省直机关总党委办公占用。大院东边是阎锡山督军府的旧居，有假山亭廊，环境优雅，省委部长们大多挤住在这里。省委书记有了三栋二层小楼，五位书记分住。家属院有三栋处长楼，单元套房，条件不错。普通干部住在阎锡山骑兵营的窑洞和一些老旧的四合院。一九六六年建好了三栋部长楼，宽大明亮，有会客厅，五居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机关设有大、中、小灶，按干部职务、级别分灶就步。尽管当时吃住等级分明，差别明显，但大家都觉得理应如此，下级有困难没奢求，上下级相安无事，和谐相处。

夏天，每到晚饭后，几个秘书长相随散步，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木制小锤，边走边轻击身上的穴位，欢声笑语，怡然自得。周六晚上，大楼地下室传出欢快的乐曲声，那里举办着舞会。机关大院歌舞升平，一片祥和景象。

谁都没有想到这里不久会成为山西文革大动荡的“震中”！

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不久，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报纸、电台狂轰滥炸，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批判的用辞杀气腾腾。此时的省委机关还风平浪静。

上任不久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带领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正在北京参加华北局会议，批判彭真和北京市委。

六月四日，卫恒突然从北京回到太原，连夜布置要掀起写大字报的高潮，迅速改变运动冷冷清清的场面。第二天，省委机要处几个青年机要员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呼吁省委领导关心机要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我们“四清”办公室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写大字报。我和研究室的几个同志翻开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灯下录》一书，挑选了关于海瑞的一篇，写了一张批判史纪言吹捧海瑞的大字报，机关很快出现许多大字报。

不久，省委领导从北京开会回来，公开了在北京会议上的斗争情况，把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揪了出来。说袁振在华北局会上批判《傅山画册》，向省委发动猛攻，是野心家、伸手派、反党分子。

省委立即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兼任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之前，北京市委改组，彭真被撤职，机关贴了一些批判彭真和袁振反党的大字报，运动一下就升温了。

七月初，省委在湖滨会堂召开大会，让袁振交待反党罪行。袁振把市委领导陈守中、李学敏等人都咬出来，说是有一个“反党集团”。许多人大吃一惊，但相信的人不多。认为袁振顶不住压力，胡说乱咬，故意把水搅浑。

省委内定要揪出“三反”分子、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搜集整理王中青的“反党言论”，准备批判文章。不久，就把王中青抛了出来。在《山西日报》头版揭露王中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以后，每天报纸都大量刊登工农兵声讨王中青的文章。王中青历来敢说，深受大专院校的学生和知识界的欢迎。他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片面性，常常发表不同的观点。比如，篮球队比赛，赢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王中青就发议论：那么篮球比赛要是输了，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吗？他认为这种作法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省委把类似这样的大实话，断章取义，斩头去尾，罗织在一起，列为王中青的“三反”言论，发表在《山西日报》上，表示山西批判修正主义的态度和决心。不久，省委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批斗王中青的“三反”罪行。

我们四清办公室的干部从简报中看到一些揭发领导干部的稿件，比如，揭发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在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回汾阳老家宴请地主、富农。我们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去了。

八月的乱象

八月八日，中央公布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接着，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中央常委进行了改组，刘少奇的位置排到了后边。这些重大举动一下使全国沸腾。省委每天有各单位敲锣打鼓来报喜。

不久，社会上开始破“四旧”，红卫兵到处砸“四旧”，把文物、古迹，所谓的“封资修”都砸了个稀巴烂。红卫兵所到之处，无人敢管，想砸什么砸什么，如风卷残云。在太原市内砸完，又跑到晋祠、五台山。哪里有名胜古迹，哪里就有红卫兵造反的行动。口号是“破除四旧”，“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先破后立”。

我们四清办公室资料组在东花园西小院东房办公，在那里组织学习讨论“十六条”。看到许多油漆工还在油漆、粉刷阎锡山旧居的雕梁画栋，就有些不满。认为外边破“四旧”，省委机关还在搞“四旧”。

省委有书记宿舍楼、部长宿舍楼，处长宿舍楼，而一般干部多数没有住房，有许多人住在阎锡山骑兵营的窑洞内。因此，我们对分管省委机关行政工作的副秘书长李志敏，极为不满。就联合写了一张大字报，并由我挑头，组织人马敲锣打鼓把大字报送给了李志敏副秘书长。我们把他叫到大院内，我当面把批判他的大字报念给他听。这是我第一次组织“造反”。

此举一出，又影响了省委组织部的干部。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王谦的老婆葛植青，在省委组织部当干部处长。此人官太太作风十分严重，早就引起部内同志的不满。他们看到我们给李志敏送大字报，也想给葛植青送大字报，出出气。组织部的刘志英、庞永贵就联系我们，我又组织人马敲锣打鼓，给葛植青送大字报。由于准备不足，没想到葛植青根本不在乎你送大字报这一套，反倒声色俱厉地把送大字报群众的气势压了下去。事后，大家纷纷表示不满，认为这次行动不成功，长了官太太的威风，灭了革命群众的志气。这是我组织的第二次“造反”。

后来，省委机关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五花八门，哪一方面的都有，各单位的群众有对领导的不满，就写张大字报发泄一下。我们四清办公室写大字报，批判宣传部处长任笃信谩骂大字报、捂盖子的言行。总之，大字报铺天盖地，四处开花。人们议论纷纷，也不知道运动如何发展，揭发出的问题由谁负责处理。许多人是随大流，也有许多人隔岸观火，袖手旁观。

不久，红卫兵把“黑五类”押上游街，然后赶回农村。有一天，两辆汽车拉着头破血流的省政协的原国民党起义军官、民主人士到省委大院，他们已被红卫兵打得血流满面，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机关大院里的人呆呆地看着，明知不对，没人敢吭声。社会已经失控，处于无政府状态。

就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一天下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平在部长楼自己的家中上吊自杀。没有人给他贴大字报，更没有人揪斗，直至现在也不知江部长为何走上不归路。

八月二十三日，忻州地委召开“向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会场没有悬挂国旗，没有举行向毛主席致敬仪式，忻州师范的学生提出抗议，忻州卫校学生反对，双方发生冲突，地委劝说无效，又不能承认“错误”，忻州师范数百学生到省委

静坐抗议，要求罢地委书记的官，省委办公楼后边坐满了学生，水泄不通，一直坚持了三天，最终省委决定撤销地委书记徐志远的职。徐在省委农工部工作过，机关干部都知道他是个很本分的老实人。撤了徐志远的职，引起机关对徐的普遍同情和对省委领导的不满。

八月十三日，太原重机学院革命造反小组到省委，要求省委领导给打成“右派”的学生平反、罢相关领导的官等八项要求，希望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应该说当时学生来找省委，还是信任省委的。但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粗暴地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窦凯并不负责接待学生，只是出于好心，出面劝说学生回校，为省委挡水，引起学生不满。开始是辩论，后又争论，惹怒了学生，揪住窦凯不放，要求处理窦凯。学生在省委二楼会议室静坐请愿了几天，为了平息事态，省委满足了重机学院学生的无理要求，撤了窦凯的职。这件事，就是当时轰动全省的“八一三”事件，引起机关干部的强烈不满，都为窦凯鸣不平。

晋中中级法院副院长郭星，用了一张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卷了鞋，被人发现，一帮人要求处理，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

类似的请愿、抗议事件越来越多，机关大院每天都像农村逢会赶集一样，拥挤不堪。直到后来省公安厅一群干部要求罢省委常委、公安厅长陶健的官，省委也果断出手。这时，机关许多干部看清了，为了保自己，省委不会保下边任何干部。省委领导开始失去人心。

组织战斗队

红卫兵大串连开始后，造反的、串连的、旅游的红卫兵涌到各大城市，太原也一样，从农村来的中小学生每天成千上万。他们无吃无穿无钱，走到哪里由地方政府负责接待。省委在海子边大礼堂招待所成立了接待站，范守同和我都被调到那里搞接待工作。接待站给串连学生安排吃住，天冷后给发棉衣，只要学生不造反，要什么给什么。

在我到接待站之前，因为在机关搞过两次造反，我、张治德、张宝山、刘志英一起商量，也想像学生一样搞个战斗队。听说中央允许机关干部搞战斗队后，我们就开始筹划。战斗队叫什么名字，七嘴八舌，既不敢用“造反”二字，也想不起别的响亮的名字，就叫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队”。尽管那时我们对省委的一些作法不满，并不明确要造谁的反，要打倒谁，实际是要紧跟毛主席，在省委的领导下闹革命。所以由我出面，找到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武正国，让卫恒同志题写战斗队袖标。

——后来在一九八四年，山西省委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说，一九六六年六月，李辅（并不是我一人）给省委秘书长史纪言贴大字报，“声称搞史纪言，是顺蔓摸瓜往黑省委根子上追”。当时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黑省委”的概念，更谈不上追“根子”。这是李立功执掌的省委对我明显的诬陷！

我们这个战斗队有组织部、农工部、四清办、城市社教指挥部、行政处、机

关印刷厂和幼儿园等单位共八十来个人参加。没有明确谁是头头、领导，头面人物就是起初筹划的几个人。战斗队成立后，我们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宣传“十六条”，分了几个组，每天晚上到街道普通市民家中宣讲。战斗队有名无实，没进行过真正的“战斗”。

九月，天还热的时候，行政处修缮队的十几个工人，在栗宽景的带领下，抄了机关行政处总务科长刘太江的家，抄出了大洋刀和刘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照片，押着刘太江在机关游斗了一圈，掀起点波动。

省委在大乱中陷于瘫痪

山西省委内部斗争第一个焦点是袁振问题。

华北局五月会议，袁振联系“三家村”问题批评省委印《傅山画册》，被打成“伸手派”、“野心家”，七月被免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对此，我认为袁振有错误，但被省委打成“伸手派”、“野心家”、“反党分子”有些过分，省委也有错误。机关和社会上同样有这两种看法。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号，太原五中高三学生刘灏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痛打卫恒黑帮》，为袁振鸣不平，矛头指向省委。

十月中旬，由五中刘灏带头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矛头直指山西省委，要求为袁振平反，恢复名誉。

十一月二日，省委在迎泽宾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被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为首的几个大学的造反组织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冲击，无法开会，转移到晋祠宾馆，又被学生造反组织冲垮，没有开成。学生造反组织要求省委交出整他们的黑材料，承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还要省委承认打击迫害袁振，为其平反。第一书记卫恒已处于层层包围的漩涡之中。每天找其接见的，与其辩论的，一批接着一批，日以继夜，拖垮了身体，不得不住院做切除阑尾的手术。手术后不久，身体还未得到完全恢复，十一月二十四日就在五一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决意要代表省委进行检查。省城造反组织认为卫恒是假检查，欺骗群众。兵团司令刘灏、政委段建忠跳到主席台上，终止卫恒的检查，会场大乱。然后刘灏、段建忠等学生就与卫恒辩论起来，让他回答袁振是不是反党分子，为什么把袁振打成“伸手派”、“野心家”？一个接一个尖锐问题，弄得卫恒难以回答。但是第一书记的威风还在，架子不倒，顶得很硬。在袁振问题上毫不让步。会场四周布置了众多的观察哨，随时把会场的情况报告给坐镇迎泽宾馆的省委第二书记王谦。天气很冷，卫恒又刚做过手术，身体不支，红卫兵揪住卫恒不放，一直到天黑，后来有人把卫恒强行解救转移走了。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卫恒也没做成个完整的检查。

运动不断升温，形势大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轮流揪斗。卫恒在轮番围攻的情况下，与群众签署了“协议”，回到机关给省委常委汇报，又被否定推翻，让卫恒出面去撕毁协议。卫恒又被揪住围攻。反反复复，恶性循环。卫恒的身体逐渐衰弱，只能勉强支撑。

省委已陷入瘫痪。为了稳定大局，华北局指令，各省成立二、三线领导班子。山西省委二线由王谦负责，由办公厅、省委文革办抽调人员组成二线队伍，应对动乱的局势。三线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领衔，从四清办公室和四清政治部抽调骨干组成队伍，转入地下，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情报联络人员坚持工作。

群众组织进驻省委大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首先造反占领了省委办公大楼一层会议厅，并占领传达室，设立广播站。

一九六六年十月到十二月，省城太原组建起来几个较大的造反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主要目的就是为袁振平反；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以太原重机厂工人张建国为首，当时配合刘灏一体行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独立判断，联合行动，有较强的自主能力。红联站的舆论做得最好，红联站的核心组织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宣传车在五一广场广播，周围总是挤满了听众。

各大学进驻省委机关的太工红旗、山农火炬、党校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在省委机关找“依靠力量”，调查省委的问题。其中我的名声较大，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寻访和联络对象。

由于毛主席的号召，机关干部都要听毛主席的话，都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我们政治研究室的人在一起议论，成立了“太行游击队”，成立后办了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张系统揭露省委搞“修正主义”的大字报，是集体讨论，由赵某某执笔起草的。这张大字报印发以后，影响较大。不用说，这张大字报是受极左影响，给省委罗列的罪状，肯定是不对的。太工红旗在省委机关大礼堂召开大会，请王大任、李志敏参加，让我在会上宣读了这张大字报。

我的行动引起机关的一些人不满，省委宣传部一个干部写小字报揭我老底，说我父亲坐过监狱，我曾隐瞒。支持我的人又批驳了这种做法。这只是一个小风波。更大的争论是在省委大门外的墙上，一些对造反派行为不满的机关干部用“党育红”、“党永生”、“党红兵”、“党育人”等化名，写了许多小字报，嘲讽、挖苦甚至谩骂造反派，反击的小字报也针锋相对给予还击。每天晚上，看这些小字报的不同观点的人，互相辩论，争得不可开交，有时围成一团，吵吵闹闹，直到深夜，最后不欢而散，第二天继续。这成为当时府东街的一道风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北京造反组织已公开声讨刘少奇。斗争范围在扩大，档次在升级。首都的造反组织向各地派遣队伍煽风点火。太原就来了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常常活跃在太原各个群众组织之中，传布北京的消息和经验。

从“五人大字报”到“一·一二”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山西副省长刘格平，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五人联名贴出了大字报，标题是：“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

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不用细述罪状，仅从标题就可以知道他们五人给省委的定性、要打倒的对象以及势不两立、决一死战的态度。他们五人站出来亮相，说明山西领导班子正式分裂，两股势力的决斗拉开了帷幕。

正当群众热议这张大字报的时候，突然，刘格平领导于一月十二日夺权了！

那天晚上，我和李春如在办公的窑洞内睡觉。半夜，打门声非常急促、响亮。问他们干什么？凶狠地说“起来，起来夺权”。我问他们是什么组织的，说是“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我俩起床后看到，这些人都穿着黑色棉大衣，大头鞋，手拿撬棍，提着麻袋。不由分说，要你交出办公图章。我们告诉他这里没有图章，他们一看也没有保险柜，就去了秘书组的办公室，要动手砸保险箱。值班人员知道无理可讲，无法抗拒，为避免破坏和更大损失，就把四清办公室的图章交出，他们装入麻袋走了。

当时，省委是“黑的”，机关干部也都变成“黑爪牙”、保皇派，政治上处于困境。机关干部是些文弱书生，“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面对手拿铁棍的一群大汉，无力反抗，反抗也没用。

一夜之间，省委机关办公室大都被砸抢，印章被装了半麻袋拉走。留下一片狼藉。

第二天一早，机关乱了营，都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弄不清情况。

早饭后，贫协的张治德把我和刘志英叫到他的办公室。张治德说，昨晚他参加了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何英才召开的会议，宣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采取革命行动，夺了省委卫、王、王的党、政、财、文大权，对他们已实行了军管。刘格平列举了卫、王、王的严重罪行。并说，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派兵支持了昨晚的夺权行动。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不知如何应对。特别是刘格平领导夺了省委的权，我的思想根本就接受不了。刘格平调来山西不久，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就告诉我，刘格平是在宁夏工作期间，中央判定他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本人腐化严重，搞了六十多个女人，而且是周总理亲自与其谈话，宣布处理结果的。卫、王、王再不好，也比刘格平强啊！

刘格平为啥敢于领导夺权？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为啥敢站出来支持？有许多疑问，搞不清，想不通。接着，太工红旗的李青山、陈新谋、于永革、杨子贵等都问我情况，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给他们。太工红旗立即发表反对“刘格平一·一二夺权”的紧急声明。并用广播车、机关广播站进行了广播。机关干部形成一片反对“一·一二”夺权的声浪。省委“文革办”的“干部造反大队”，也贴出了反对刘格平夺权的大字报，很有影响。

当天，红联站紧急磋商，研究如何行动。杨保明、段立生等红联站的领导认为，刘格平“一·一二”夺权行动只是抢图章，抓人，并没有真正掌权。我们要采取行动，发动要害部门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夺取要害部门的权力。确定的要害部门是公安厅、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然后分别组织力量，落实行动计划。

当天晚上就采取了行动。太工红旗分配去山西日报社，他们对山西日报社两

眼一抹黑，认不得一个人。想请我参加，联络报社的革命同志。

晚上9点多，天又黑又冷，陈新谋不知从哪里弄了个旧吉普车，拉了几个人就直奔山西日报社。陈新谋第一次开这样的吉普车，车况又不好，车开到并州路出版社门前就抛了锚。我们跳下去推车，西北风呼号着，冻得人们缩手缩脚，生怕铁板沾去了手上的肉。经过折腾，终于到了报社。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都已赶到。我找到了党校的老同学石敬铭，石敬铭和另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战斗队，是报社的造反派。红联站的人和石敬铭等人就交谈了起来，说明来意和一起夺取山西日报社领导权的行动计划，最后统一了思想。山西日报社的革命派造了反，不再承认山西日报是省委机关报，暂时只发新华社的通稿，不发地方新闻。

其它几队人马，在公安厅、广播电台都不顺利，遇到了麻烦，有的还发生了冲突，一直僵持在那里。以后，刘格平的总指挥部知道了红联站的行动，他们所属的决死纵队、工人造反兵团也插足到这些要害部门，更形成了对立和混乱的局面。

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

另一方面，各大造反组织纷纷派人到北京，打探中央文革对刘格平“一·一二”夺权的态度。省委文革办的“干部造反大队”张杰德几个人也去北京打探中央的态度。

一月十七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民族饭店接见了山西各方面的代表，明确表态山西省委卫恒、王谦、王大任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等人的革命行动。十八日一早，太原大街上贴满了中央“支持刘格平”的北京来电。

省委机关各部门纷纷起来“造反”，成立了许多战斗队。

张杰德等人从北京回来后，立即串连省委机关各个战斗队联合组成“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马超骏、张杰德是发起人，当然成了总部一、二把手。

从我内心深处认为卫恒、王大任是好人，怎么也不应该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央文革就能一锤定音吗？机关好多人感情上转不过弯子，还想等党中央、毛主席最后表态。当天上午，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并州饭店批斗卫恒，给卫恒挂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卫恒死活不挂，发生了推打和冲突。机关干部反对并谴责会上的过激、过火行为。

总部成立后，为了表现革命造反，在机关大礼堂开过一次批判大会。卫王王都关起来了，想批也批不上，又把王谦老婆葛植青作为主要出气对象，拉了个组织部副部长柴守约陪斗。会上葛植青抗议“坐喷气式”，与扭押人员发生了冲突。动乱时代，极左行为在机关也会发生。不过，也不能全怨群众。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的老伴师德青在省纪检委工作，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尽管王大任也被打成走资派，但整个动乱年代全机关两派群众没有给她贴过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以后，张治德与刘志兰来往较多。不时了解刘格平等人的活动的一些情况，知道了刘格平曾被中央文革叫去北京谈话，夺权其实是中央

文革授意。

中央文革为了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打击刘少奇，树立一个与六十一人相对立的“坚持共产党人革命气节的典型”，就不顾历史事实把刘格平吹捧起来。后来曾参加过六十一人案平反工作的曾彦修在口述历史时向采访他的邢小群女士说道：一九七七年春天，于光远到上海办事，我俩谈到六十一人案。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中央对这件事是最清楚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批准的呀！我们那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人都知道的。“七大”前后，考虑到一些同志要在中央工作，还让老同志专门告诉了我们。这在延安是众所周知的。康生亲口对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只要把他讲给我们的话原原本本写出来，就能彻底揭穿事情真相，最妙的是我们连康生的很多原话全记得。一九四八年，我们参加土改工作试点团在山东，康生是团长，于光远和我都是团员，那是除夕，区党委请吃饭。区委组织部长刘格平是回族，他不参加我们吃饭。第二天在他自己房子里又请了我们一次。那天在刘格平住所吃完饭后，康生照例带我们一群人到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说到刘格平。他说刘是个老党员，可是一提起《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为了说明刘格平如何古板，康生就详细给我们讲了六十一人出狱的事。一九三六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当书记，柯庆施提出，华北形势很危急，需要干部。这些在狱中的同志，要么落在日寇手里，要么让蒋介石提到南京去，都很危险。宋哲元也不愿这些人留在自己手里，表示，这些人登个启事，就可以放出去。北方局认为，我们的同志都已经过几年残酷考验，已经证明他们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决不会登“反共启事”出狱的，但现在要他们赶快出来工作，由中央决定特许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他们便什么错误都没有了。报告是刘少奇打给中央的，中央讨论后，表示同意。由张闻天答复刘少奇，张闻天当时是总书记即代表中央。对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起先都不相信，坚决不出来；经过组织反反复复做工作，并强调是中央决定，如不出来，违反纪律自己负责等等，他们才陆续出来。曾老说，康生说这个事件经过时笑着说，刘格平就是不出来，所以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监狱，直到日本投降。

一九七八年薄一波在一次谈话中说道，刘格平的叔叔是山东大财主，通过关系打通狱方关节，把刘格平从大监房照顾到条件较好的处所。当中央下达出狱的决定时，狱中党支部无法通知刘格平，所以他多坐了几年，根本不是康生说的“古板”，更不是后来文革中康生说的、刘格平吹的“抵制刘少奇活命哲学、叛徒路线”。康生故意制造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从“一月风暴”中夺权的四省、市的领军人物看，有三个是来自渤海地委的，都是康生的势力。康生借夺权之机，垒自己的山头。

各色人物乱中亮相

一月二十日后一天下午，我的老同学、省委办公厅干事任传兴找到我，说要有事和我商量。

他说：“一·一二”夺权的那天晚上，当山西工人造反兵团的工人们去办公

厅抢章时，我们都不敢交出山西省委的公章，又不能完全拒绝交出图章。就把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的图章交出去，打发走了抢章夺权的工人。现在，省委的大印还在我们手里，办公室担心造反派发现骗了他们后，卷土重来，丢了图章。每天一到晚上李爱卿（女干部）就把省委大印拴在裤腰带上，在府东街上来回跑。为了省委图章的安全，办公室的同志认为，机关内你们最可靠，所以想把省委的章交给你们。我说我得和其他负责人商量一下。

经商量决定举行一个造反夺权的形式，把省委图章转给我们保存。就在当晚组织二百多机关干部，包围了省委办公大楼，还砸坏一个门子，把山西省委大印转移了出来，这是我参与组织领导的第三次“造反”。图章就交由张杰德保存。后来核心小组要按省委印模制章，因我曾向刘志兰讲过“夺印”的笑话，讥笑过“一·一二”夺权没把省委大印夺走，她知道在我们手里保存，就让我把省委图章交给她。这是发生在那时的一段趣事。

夺权后的省委机关大院，如同战争中失陷的城池，无头、无序，乱作一团。社会上的造反派随便抄领导干部的家，甚至把家里人赶走，他们进来安营扎寨。一些“杂牌军”打个造反旗号乱偷乱抢，有的不三不四的人甚至在被抄被赶出去的高干宿舍鬼混。我们在省委秘书长史纪言家中，就发现了这样一帮人。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整顿大院的秩序。

被山西农学院火炬战斗队弄走的卫恒老秘书李玉明，早先已转入二、三线活动，突然写出大字报反戈一击。揭露卫、王、王有一个特务系统，农工部长阴发祥就是特务头子。

这张大字报就贴在机关图书馆门前，看的人很多，具有轰动效应。因为刘格平五人大字报中就写到卫、王、王组织特务，镇压群众。李的大字报正好印证了这一事实。李是二、三线的人，站出来反戈一击，端出“特务组织”的头目，这是内部崩溃，具有说服力。一九六六年底，省委大门口有以“党”姓命名的咒骂红卫兵、造反派的所谓“党氏兄弟”，这时也吃不住社会压力，有的倒戈，暴露出真相。如文革办公室的张武文就站出来反戈一击了。

总之，这一段机关特别乱，各色人等纷纷亮相，新闻迭出，目不暇接，使过去许多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事情，露出了端倪。这是“一月风暴”巨大压力导致的结果。许多人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确实想跟毛主席闹革命。到底是对是错并不清楚，实实在在是跟着感觉走的。

尽力保护一些干部

“四清”运动没有结束文革就开始了，原来省委派到大学、大工厂的工作组，运动搞不下去就回机关了。“四清”时得罪了群众，那些被整过的人，认为省委倒了，报复的时机到了，就到机关揪工作组的领导人，有的省委部长就被揪走。

看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应对机关领导干部的生命安全负责，于是就成立了“监管小组”。那时，怕戴“保皇”的帽子，只能叫“监管”，不可能叫保护或安置。让这些老同志集中居住，组织他们学习。为了让这些老同志有个舒适的环境，

专门把阎锡山原来的住屋，后来是省参事室的办公室腾了出来，选拔刚转业到地方的军级干部刘乾负责此项工作。好多老同志对此感激不尽，觉得在此居住有了安全感。对一些惹人注目的干部，如组织部长胡晓琴、副部长张念先、王朝进等，还专门转移到省委党校加以保护。

武正国从我们政研室调出去给省委第一书记当秘书，没过几天好日子，多的是陪斗、当人质。“一·一二”夺权以后，特别是一月十八日中央文革表态以后，我和李春如、张嘉滨等认为武正国处境很困难，不断有人揪他，要了解卫恒与某一组织的关系，麻烦多，不安全。与武商量让他参加“太行游击队”，如果再有群众组织来找他的麻烦，我们就可以出面保护他了。他同意，并与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部长打了招呼，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与卫恒划清界限，脱离关系。

我们还把在党校受困、处境艰难的赵凤翔也请到省委机关，请他参加“太行游击队”的活动。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想帮他们一把。

长期在晋祠疗养的省委书记郑林、朱卫华，也跑回机关找到我，提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也让其写大字报表态，保护了他们。机关普遍认为这二位老书记一个是晋绥派，一个是晋察冀派，长期受卫、王、王排挤，小病大养，没什么工作，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就表示支持他们站出来闹革命。

为参加“总指挥部”开除一、二把手

一月十八日，关锋已经明确表示了支持刘格平等人的态度，所以，我也开始与刘志兰接触，并根据总部决定提出申请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请她帮助。

刘格平等组织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刘志兰任办公室主任。刘志兰除从省委农工部调了她熟悉的李玉庭、郭向伟、苗葆惠、张粉莲以外，还想从机关调人，请我给她推荐，因工作关系来往较多，后来就把刘祖武、刘乾、范守同、赵稚聚等人都调到了核心小组办公室。

机关联合起来的群众，强烈要求参加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派人审查，发现文革办的干部造反大队贴过大字报反对“一·一二”夺权，还有两个组织有“党氏兄弟”，组织不纯，必须开除后才能考虑。把总部一、二把手要开除出去，真难坏了我，怎么办？战斗队长会议压倒多数表决坚决开除，在上、下强大压力下，没有别的选择，马超骏、张杰德就被开除出去了，大家推举我牵头。省造反指挥部不允许用“原省委机关”冠名，起个什么名字？太“左”了，接受不了；“右”了通不过，还要体现是党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大家费尽脑筋起了个“七一公社”，此名，机关干部普遍满意，皆大欢喜。

北京“三司”来找杨尚昆

一月二十四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通告，如同放了一颗原子弹，震动了三晋大地。

广播以后，参加夺权的组织欣喜若狂，反对夺权的垂头丧气。参与和支持“一·一二”夺权的组织出动人马，打砸反对“一·一二”夺权的组织。太工红旗设在机关大门口的广播站，因为一直宣传反对“一·一二”夺权，最早被砸了

个稀巴烂。街道上有敲锣打鼓的，有燃放鞭炮的，游行队伍也开始出动，欢庆胜利，欢呼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整个太原沸腾起来了。

正在这时，有一队身穿军大衣，臂带“红卫兵”袖章的人马，讲的流利的京腔，闯进省委机关大院。他们见人就打听杨尚昆关在哪里。机关的人根本不知道山西还关着杨尚昆。后来，他们找到财务科，说他们是北京“三司”的，印制“百丑图”，就少了杨尚昆的照片，现在要在山西找到杨尚昆，揪回北京去批斗。许多人都说不知。有一个管出纳发放工资的人说，发放工资时，表上有一个杨老四，工资级别很高，不知是不是杨尚昆？问一般干部问不出来，他们就径直找卫恒的秘书武正国了。别人不知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总该知道关押杨尚昆的地方吧？

当北京的红卫兵找到武正国时，他拉着小平车，正准备把临产的老婆送往医院。武正国躲不开，只好求救于保护他的“太行游击队”。我们也无法劝走北京来的红卫兵。在无奈的情况下，武正国答应引领北京的红卫兵去关押杨尚昆的地方。为了对武正国的安全负责，我、张嘉滨、蹇仕明等跟着武正国。去的地方是新民东街天地坛六号，这地方我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据说是解放前山西名流赵承绶的公馆。

北京学生到达天地坛就爬墙打门折腾，保卫部队马上紧急集合，然后打开大门，大门不远处用白灰划出一条警戒线，一位领导出来警告北京学生说：“我们这里是军事要地，谁要越过警戒线，开枪打死概不负责！”一下把学生镇住了，僵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出面和军队负责人协商，说明北京学生的来历和目的。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是独立师警备营的段营长，经过我的解释，态度也缓和了。他说：“我们是负责保卫这个地方，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我们上级单位省军区去请示。”

这样，北京的学生又让我们把他们领到省军区找政委张日清。张政委那时正好不在，在军区传达室等到次日凌晨一点多，传出张政委的答复，说：“杨尚昆早不在那个地方了，学生们如果不相信，可以进去看看。”

因为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夺权通告，我还急着有许多事要办，所以我赶紧回到了机关。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就去西院找刘志兰，让其尽快帮助七一公社参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卫恒之死

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造反派纠缠中身体垮下来，又做了阑尾切除，本应休息，恢复身体。但造反派轮番揪斗，刘格平抓捕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有人挺身而出，为卫恒解围，也可以喘息一下。过去，江湖上能见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战场上能见到为保护战友而牺牲自己，而这时省委班子里的成员却是只顾自保，一旁观望，有的甚至幸灾乐祸。卫恒被造反派围攻，挺不住了，就签了一个妥协的协议。带上协议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又被训斥“软蛋”，要他撕毁协议。

卫恒在两难的情况下，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于小灶食

堂开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出准备给中央写信提出辞职。这时第二书记、省长王谦拍案而起，大叫：“卫恒你死也得死在第一书记的位置上！”同时，王谦、赵雨亭、贾俊等九名常委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告卫恒的状，阻止卫恒辞职。这是参加会议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会后透露出的实情。这些人不帮不救，陷卫恒于绝境。

一月三十一日，社会上传出了卫恒自杀的消息。晚上，刘贯一叫了我们七一公社几个人到他家里，说：“卫恒已经自杀。中央专案组来人提审卫恒，让他交待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要员安子文的问题。提审后，卫恒就畏罪自杀了。卫恒的棉大衣藏掖着许多安眠片，趁看管人员打盹，他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亡。”事后知道这是政客们制造的谎言。

卫恒去世以后，刘格平等入非常紧张，曾让公安厅法医作自杀身亡的鉴定。法医坚决拒绝，后来，法医还因此遭受牢狱之灾。刘格平等人也下工夫作应对准备。秘密将卫恒尸体解剖，把五脏六腑切除下来，派“捕猎大队”的冯长暄等人带上遗体标本到上海医院进行鉴定，判明死因。当一九六七年在京参加七月会议的时候，冯长暄也赴京开会，才听到有关卫恒死亡的真实消息。

卫恒的夫人张坤秀一九七五年曾给周总理写信，要求中央为卫恒伸冤，认为卫恒是被害而死。后来中央向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了解情况，谢将上海医院化验鉴定的报告上报给中央。

卫恒之死，显然，刘格平、杨承孝等人的残酷迫害是主要原因。

夺权者建立恐怖新秩序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山大八八请罪的队伍，整齐而又悲壮地开进省造反指挥部大院。他们反对“一·一二”夺权，曾“炮打关锋”。这时出于对最高领袖的迷信，相信是自己错了，赶快到指挥部请罪，表示悔改。

二月一日在五一广场召开批斗大会，许多军警全副武装，在五一广场和迎泽大街戒严。会后，几十辆军车由枪上刺刀的战士押着原省委的领导王谦、王大任、贾俊、赵雨亭、武光汤，还有市委的赵力之等人，胸前都挂着写有各人名字、标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在迎泽大街游街示众。那真是杀气腾腾，一片恐怖。以恐怖的手段，来维护他们夺权的成果。看到这些情景，真觉得革命风暴太恐怖可怕了。

省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也难逃厄运。“三线”骨干、我们四清办公室主任刘贯文，省委书记、副省长郑林的秘书周文，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的秘书侯欣贵，副省长王中青的秘书罗光德，卫恒前任秘书刘建基，甚至连卫恒的公务员小于等都被关进了监狱。

省里“一·一二”夺权以后，各地、市也纷纷夺权，一直夺到县里。省、地、县三级的主要领导大都关进了监狱，说是“军管”。在监狱一直关到一九六九年。共产党的干部坐共产党的监狱，做恶梦都未曾有过，却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省委机关形成两派组织

二月中旬，中央批准山西成立核心小组，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

成员有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徐志远等。核心小组成立后，加紧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

二月中旬，在满足省造反总指挥部提出的要求，开除了三个战斗队之后，七一公社获得批准参加了指挥部。

山西省委机关有七百多人，五百六十多名干部，不到二百工勤人员。七一公社就有五百多人，下属战斗队覆盖了机关各单位。七一公社也成了省委机关的代表和办事机构。省核心小组和总指挥部有什么事都找七一公社。

原来省委行政处有一个栗宽景为首的“工人造反大队”，后来七一公社开除出去的部分干部，还有省直总党委和机关党委与七一公社下属战斗队观点不同的人员都与“工人造反大队”联合组成了“战到底兵团”，他们参加了省人委机关的“东风兵团”。栗宽景、张杰德、和景春（总党委干事）是三个主要领导。从此，省委机关出现了不同派别的两个组织。

刘格平夫人丁磊，曾代表刘格平把我和刘志英叫到她的办公室，交待任务。她说：“省委特务、二三线和‘党氏兄弟’都发生在你们那里，你们负责彻底查清，并向我汇报。”根据丁磊的指示，我们组织了专案组，开始清查工作。专案组给自己起名叫“抓鬼队”，因此伤害了一些同志，也成为后来定我“三种人”的一大罪状。

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要召开全省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刘志兰告诉我，给省委机关参加会议八个代表名额，要求有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七一公社经过商量决定老干部代表为张念先、任贵仁、刘祖武、刘乾，群众组织代表由刘志英、张治德、原家德和我参加。

因为会议代表名额，引起了省委机关另一派组织“战到底兵团”的反对。他们到处贴大字报，说“七一公社”是反动保皇派组织，一直到开会期间他们还贴，但是没有起什么作用。最后参加会议的我、刘志英、张志德、原家德、任贵仁、刘乾都被选为省革委委员。

新政权从“四一四”分裂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都经中共中央批准。

三月二十六日，省核心小组在湖滨大会堂召开批判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流毒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展开大批判，向党的生日献礼，七月一日结束山西文化大革命。

会议结束后，省委机关各部门都反映，搞大批判没有资料，要把文革前期存入省军区的档案材料借出来。经我请示刘志兰，核心小组办公室开出了介绍信，省委各单位就在省军区借回了一部分文件资料。

不久，以大字报的形式开展的革命大批判，在机关单位展开了。形势似乎相对平静一些，尽管人们怀疑七月一日能否结束文化大革命——因为结束不结束不是山西一个省的事，也不是刘贯一说了算。但是，人们还是热切期盼结束文革，

想过平平稳稳、安安定定的生活。夺权到手的领导干部，更希望形势稳定，保住江山。

人们良好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历史并不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

参加夺权的袁振，夺权后比原来的职权都小了，只分工管生产，特别是太原市的大权交给了陈守中。刘贯一任核心小组秘书长，掌握了权力“中枢”，夺权后抛头露面，演讲报告，风头出尽。刘志兰是核心小组成员兼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核心小组日常事务。她从省委机关调了许多干部。刘格平夫人丁磊没有官衔，也没有把她支持的“东风兵团”人员安排到核心小组办公室担任要职。这种权力部局，必然要引爆新的权力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许多人走上街头，按照统一的安排贴大标语，“揪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倒刘、陈、刘”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当时说这是“四一四红色风暴”，打头阵的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六中 32111 战斗队。

不久，以山西革命造反决死纵队、山西电力造反兵团、太工永红、东风造反团等组织为主，联合成立批刘邓山西红色造反总站，简称“红总站”。杨承孝、郝廷云、高翔、黄锐庵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刘格平老婆丁磊是真正的首领，刘格平、袁振是支持者。后来，陈永贵也成了该组织的后台。

看到如此巨大变化，我心里纳闷，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中央刚刚下达文件批准的核心小组成员，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了“黑手”？后来知道始作俑者还是江青。那年三月，江青说过“刘志兰不是好人”，这句话被太原六中 32111 最早获知。四月，中央文革解决山西核心小组不团结问题，又批评过刘志兰。炮轰刘志兰其实是奉命造反。

山西夺权的核心发生分裂，重新洗牌，是又一次为分权分赃展开的激烈斗争。该站在哪一边，该支持谁？又得重新选择，事实上也无法选择。因为省委机关另一派“东风战到底兵团”已经站到了反对刘、陈、刘的一边，我不可能成为“战到底”的“战友”。历史有时不容自主选择。

对于刘、陈、刘，我只是和刘志兰联系较多。文革前，只知刘志兰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是太原市委书记陈守中的夫人，其它知之很少。“一·一二”以后，和刘志兰接触多了，知道她性格直爽泼辣，能力很强，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陈守中给人的印象是文雅、善良，也不像是搞阴谋的人。事件突发后，刘志兰也心中不快，主动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世和革命经历。

刘志兰出身于北京一个富裕家庭。参加革命前在北京上学。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她响应共产党号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抗大”学习期间，被介绍给左权，与左权结婚后，随军到了太行革命根据地。在左权牺牲后，朱总司令写信赋诗，歌颂了左权将军的高贵品质、指挥才能和牺牲精神，也给予刘志兰亲切安慰。刘志兰还收到了林彪为悼念左权将军写的长诗。她把珍藏了多年的文物拿出来给我展看。我为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友谊而感动，也为老一辈革命家对刘志兰痛失亲人的真切安慰而感动。当我看到副统帅和左权以及刘志兰的亲密关系，更

觉得刘志兰应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的人。对于一个著名烈士的遗属应该同情支持，绝不应该打倒。加上，我对刘格平的固有看法，以及袁振看风使舵的表现，我就坚决站在刘、陈、刘一边，反对炮轰刘、陈、刘，认为这是刘格平、袁振的政治阴谋。

不久，山西大学的一个同学在京电话采访了叶群，叶群高度评价了刘志兰。我认为这已经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不久，我和刘志英见到了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谈了对四一四和刘、陈、刘的看法。明确反对分裂核心小组、炮轰革命领导干部的作法。有了支左部队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更坚决了。

组织遭打砸抢，我被绑架游街

山西核心小组成立后，刘志兰担任核心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核心小组办事机构从省委机关调去的工作人员较多，引起了东风兵团和丁磊的不满，把七一公社作为打击的目标。

他们认为七一公社支持刘志兰，并怀疑七一公社整理了刘格平和袁振的黑材料，所以策划太机四野、太工永红、太工红心等组织，于四月廿九日、五月一日、五月二日连续三次打砸抢省委机关，把七一公社下属组织的所有材料洗劫一空，特别是把各部门从省军区借回来的档案材料也抢劫一空。

战到底兵团参加了东风兵团，站在坚决打倒刘陈刘一边。七一公社被打砸抢，同在一个大院、一个办公大楼的战到底兵团的所占办公室安然无事，毫发未损。

他们打砸抢一次，没有发现整刘格平、袁振的黑材料，就再来一次，还是没有，恼羞成怒，又于五月二日第三次大洗劫，把我绑架，押在大卡车上，从府东街到新建路又到解放路，一路游街示众。

最后，打砸抢队伍集结在山西医学院，应山医工学干造反兵团之约，准备血洗山医红革联。红联站知道绑架我并围攻山医红革联的情况后，立即组织队伍赶到医学院，声援红革联，营救李辅。上午9点多，从一辆汽车上把我抢救下来，保护到医学院。这次数千人的对抗，后经核心小组和部队的干预，没有形成大规模武斗。那时，已能看出红总站刘格平、丁磊的支持下，已经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要消灭反对他们的组织和代表人物了。

七一公社在我被绑架游街，机关被洗劫之后，立即奋起反击，详细揭露了太机四野、太工永红的打砸抢罪行，并印发传单散布到社会。隔了两天，省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我忍受着全身疼痛参加会议，控诉了太机四野、太工永红的罪行，要求立即查处打砸抢分子，归还全部被抢劫的资料。

结果，会上、会下都没有人过问此事，显然刘格平是纵容的。一九八四年，省委书记李立功定我“三种人”，把丢失省委档案材料定为主要问题。在这里，他放走了抢劫的强盗，诬陷了无辜的失主。

七月会议使我对中央产生怀疑

“四一四”以后，形势更乱，多处发生武斗。六月下旬开始，太原被打压的一派群众看到在山西没有人主持公道，刘格平等人完全站在红总站的立场上，对

他已不抱任何希望。所以纷纷组织人马去北京告状，向中央反映山西的问题。

七一公社先是刘志英去了北京，后来，我和张治德也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赴京本应高兴、兴奋，去看天安门，逛西单、王府井。但是，山西的斗争形势，群众被镇压的恐怖气氛，使我根本没有心思游逛。北京到处是人，各地两派的群众在本地斗争相持不下，都要到北京，想请中央判明是非。

在北京找一个住处都非常困难。刘志英凭借中组部的熟人关系，住在了组织部锡拉胡同招待所，我们去了以后就挤住在那里，后来又先后去过团中央招待所，三里河红卫兵接待处，最后落脚到崇文门外花市大街一个旅馆。四个人一间房，一人一天一元钱房费。

七月初，中央把山西核心小组的人马全部叫到北京。我们就跑京西宾馆、北京军区，找张日清、刘志兰打听消息。红总站的人马有权有势，住得集中，条件也好，形成整体，摆出了决斗的架势。红联站无权无势，散兵游勇，到了北京才相互串连，在三里河树林子里集中开过几次会，研究如何给中央反映问题。

七月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召开。中央领导要接见两派代表，要求各派 60 个人参加。红联站段立生、杨保明组织人马，安排发言，我也被纳入 60 人中参加会议。

晚上，到了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康生、关锋接见山西两派代表，先让两派代表发言。红联站首先是太原市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承琚发言。王承琚还没说两句话，红总站就递给康生一个纸条，康生念道：王承琚来京带有枪支……刚念到“枪支”二字，马上有几个大会堂的警卫人员就站到王承琚身边，看管住他。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与王承琚相随的太工学生李善良站起来为王辩护，说王来京前已把枪交给太原武装部，来北京没带枪。康生说：你是个学生，不懂得斗争的复杂性，容易被坏人欺骗。你不要相信王承琚这样的坏人。一下子王承琚就被打成了坏人。

接着兵团王清英控诉山西专政委员会关押她的罪行。红总站郝廷云揭露刘、陈、刘。杨承孝控诉卫、王、王黑爪牙对他打击迫害（指红总站包围了党校东方红，为给党校东方红解围，红联站抓了杨承孝一事。当时是我接段立生电话后派人侦察到杨承孝行踪，给十中七一打了电话，红联站组织人去抓了杨承孝），并拿出证据，说抓捕他是七一公社给十中的红卫兵打的电话，进行指挥。七一公社就是山西卫、王、王的黑爪牙。又揭露谢振华接见七一公社代表发表谈话，支一派压一派，并拿出了我们七一公社整理印发的谈话纪要。

会上，康生批评了张日清，斥责了夺权后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把其负责人军区干部兰敏说成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对刘贯一、刘志兰更是严厉训斥。会议完全是一边倒，根本不让你说不同意见。康生的那种霸道，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起一九五八年康生到山西农学院视察，把山西农学院教授康星卫骂得不如山东农村妇女。那时我就领教过康生的蛮不讲理。将近 10 年又见到了康生，还是一副恶霸相。

由此我对党中央产生了怀疑。中央，过去我认为英明无比，至高无上，掌握全部真理。如今一看，这帮人如此无理。因此，我也失掉了对政治的信心。现在

看来，哪有什么路线、是非、对错，群众都是被利用的工具。中央内部争权夺利，各有山头、各有派系，下边也有他们的代理人。他们支持谁、保护谁、打倒谁，是由他们的私利决定的。群众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斗得晕头转向，打得头破血流，其实是运动群众，群众被耍了一把。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会议，康生、关锋认为刘、陈、刘是坏人，红联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带着失败的绝望，我们离开了会场。人民大会堂，光辉夺目圣洁的殿堂，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却留下灰色的阴影。

七一公社一夜间土崩瓦解

第一次接见后不久，太原传来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山西问题的“七一九”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太原市敲锣打鼓，欢呼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同时红总站倾巢出动，镇压各单位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传来消息说，在强大压力下，七一公社各个战斗队纷纷造反，反戈一击，退出七一公社，一夜之间，七一公社土崩瓦解。

当时，北京有两大热点。一是天安门广场开会，声讨陈再道和武汉百万雄师。另一是在中南海西门、北门搞静坐，要揪斗刘少奇，总的感觉是文革又升级、升温了。

全国的事、别的省的事与我无关，我只关心山西的事。从第一次中央领导接见，本来大势已定，但失败者总不甘心。红联站的人马在段立生的组织下，又重新组织材料，想扭转中央的定论。甚至还希望毛主席出面讲讲山西问题，否定中央文革的意见。坚持斗争，永不服输，这是我们当时的决心。

经过几天的等待，八月五日，中央文革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西两派代表。会上根本没让两派人员说话。康生、关锋先后发言。基调是支持刘格平，批评张日清，点名刘、陈、刘是坏人。既批评红联站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又劝说红联站认识错误，转变立场，支持刘格平。会后有一个“七月会议纪要”，就是这次会议形成的，文件上也指出红总站不要翘尾巴，不要犯新的错误。但根本无济于事。太原传来的尽是红总站搞武力镇压的消息。

接父亲急电回乡避难

八月六日，突然接到父亲拍给我的电报，说家中有急事，让我回去。我怀着失败的心情与对中央的失望，离开北京。

八月七日，我回到了应县。在家住了一两天，太原各大学的学生纷纷往家乡逃跑。特别是山西农学院的学生，跑回来的更多。说是杨承孝带领决死纵队攻打平遥县城，营救被围困的陈永贵，在返回太原的时候，路经太谷，捎带攻打山西农学院，镇压了“山农火炬”——因为此前杨承孝被红联站的人抓捕后在山西农学院关押过。

杨承孝知道七一公社参加了那次抓捕他的行动，所以七月会议以后，他派人几次到省委机关搜捕我。幸亏我回了老家，要不然很可能和李希哲一样被害死。

李希哲是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的一位保卫干部。在东北时就知道杨承孝的生父是国民党警察所长，剿共大队长，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所以杨承孝造反当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到处搞打砸抢，李希哲认为这是沉渣泛起，阶级报复，一直揭发杨承孝。

一九六七年四月，李希哲找到我，让我帮助印发过一张揭发杨承孝家底的传单。七月会议以后，李希哲被杨承孝抓捕，严刑拷打，最后打开了高楼的窗户，对李希哲说“给你一条出路”，李希哲在无法忍受折磨的情况下，纵身跳楼身亡。这一命案，是一九七〇年杨承孝被依法判处死刑的罪状之一。

我在应县期间，老岳父搜集太原的传单，给我寄回老家，使我能及时了解太原的形势。我知道短期不能回去，爱人慧英带着女儿也回到了应县。慧英从太原带回来的传单，让我知道太原十中被红总站围攻，开枪打死孟玲玲、李成义二人，制造了流血的“九五”事件。在“九五”事件之后，丁磊讲话说，“李辅在太原十中武斗工事里，指挥了武斗，后来从地道里逃跑了。”这真是天方夜谭。从谣言制造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是绝不会放过我的。这时我才庆幸回到了老家，感谢父亲对我的搭救。

我被毒打后关进地下室

七月会议以后，战到底兵团因炮轰刘志兰成为胜利者、大左派。在省委机关占据主导地位。栗宽景地位也发生变化，把原省长王谦的红旗轿车作为他的专车。积极参加社会重大事件，派人围攻十中，参与了“九五”流血事件。机关设立了审讯室，对老干部辛毅山、贺青禾等多人审讯、打骂。他们还从交城招来农民组织武斗队，后来在红楼修筑了武斗工事，制造炸药，搞到了武器，成为机关谁都害怕的组织。

国庆节前，中央发布公告，要求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必须在限期内回到单位，措辞十分严厉，态度也非常坚决，这又给我很大的压力。不回去，担心按中央的公告受处分；回去吧，又担心被红总站抓起来受折磨。

当时，我还把中央的指示当回事，认真执行，其实天下大乱，谁还管得了谁！我让在太原的慧英，找我最信任的朋友李春如，请他帮助分析一下形势和利害，帮我拿一下主意，到底回不回太原？商量的结果是按照中央的规定还是早回太原吧！

这样，我在十月上旬就回到了太原。回到太原后住在家里也不敢出门，只是请李春如到家里来商量如何行动。商量后认为，写上一张大字报贴出去，作个自我批评，表示一下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决心，先亮个相，试探一下动静。

十月十六日贴出去大字报，十月十八日，刚给我女儿过完周岁生日，下午四点多，省委机关战到底兵团就派了几个人到家里把我抓了。抓到他们占据的原机关图书馆，这里有一间房子，前后窗户都用木头钉死，黑咕隆冬，成为审讯室。把我押到那里后，机关行政处工人董存林一个耳光就把我的眼镜打个粉碎，眼冒金花，踉跄跌倒在地。后来又是崔岩顺、乔立德、李廷富几个人，还有太工红心

的学生，轮番踢打，审问我这几个月跑到哪里去了，让我交代“反对刘格平，死保刘志兰”的“罪行”。除了观点不同，我没有干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也没有搞过任何阴谋。只能说说情况，这使他们大失所望，不满意就推就打，打得我几天不能翻身。晚上把我关在东院汽车队的地下室，由交城农民看管。

抓住我，他们认为逮住了“要犯”，肯定能从我嘴里弄出惊人的内幕材料，以便他们邀功请赏。所以，舍不得把我交给决死纵队杨承孝。从这一点我还得谢谢战到底兵团及其头头栗宽景。

关押在地下室，交城民工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轻易不敢和我说话。每天他们帮我在食堂打饭，炊事员给我打的饭又多又好，他们不知道炊事班全是我的战友。

关押的最初阶段，隔一两天就在夜间“提审”一次，打得最狠的是太工红心一帮学生，从我嘴里弄不出什么东西来，他们的劲头也松了下来。后来我和战到底兵团打手崔岩顺聊起来，知道机关修缮队的几个转业军人，都是从省军区来的，在独立营呆过，是我老朋友、军区作战处处长关文照手下的战士。他们知道这层关系后，怕事后不好向老首长交代，也对我关照起来。

我爱人知道关押我的确切地址后，找到战到底的头头栗宽景，要求见我。栗宽景刁难，我爱人与他大吵，指出：我家的人我知道，什么问题也没有；你必须对他的安全负责。否则出了问题，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的爱人临危不惧，义正辞严，大义凛然，从气势上压倒了栗宽景。栗宽景只好放松对我的管制，让我与爱人见面。她来看我时给我带了本书，我就在里边看看书。

那时，高音喇叭很多。广播中除去播放各造反派组织的宣传稿件外，也播放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其中马玉涛唱的两首歌曲《看见你们格外亲》、《老房东查铺》，特别动听。看管我的交城农民学唱，并找来歌页，我也跟着学唱。后来，这两首歌我能全部一字不拉唱下来。从地下室放出来之后，每当我听到这两首熟悉的歌声，就回忆起那段失去自由的在地下室度过的艰难岁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旬，战到底兵团召开了一次批斗刘志兰大会，把我拉去陪斗。在那次批斗会上，我又“坐”了一次“喷气式飞机”。

刘志兰原为左权将军的夫人，她在左权将军牺牲后，忍受巨大悲痛，抚养唯一的女儿左太北，她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朱德、彭德怀都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彭德怀还把左太北作为义女养了起来。解放后，刘志兰先后任北京市委党校秘书长，包头钢铁公司党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又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陈守中一同调来山西工作。刘志兰和其丈夫陈守中来到山西不受重用。尽管刘志兰很有水平，工作泼辣，性情直爽，但也很难取得省委的信任。作为年轻干部的我，涉世很浅，对于不平、不公的事看不惯，爱打抱不平。我在文革中保刘志兰，也是出于对左权将军有朴素的革命感情，为刘志兰在山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打抱不平。这是我嫉恶如仇的个性所决定的。就是为这一点正义感的表达，我文革中被游街示众，关地下室，批斗、毒打、“坐喷气式飞机”，受尽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抗争一次，被打击一次，抗争愈烈，遭受的打

击也愈重。

社会上曾经说造反派为“权”、为“名”、为“利”、为“官”，这要么是猜想，要么是以偏概全，要么是胡说。从我的经历看，毛主席、党中央号召“造反”，我能不响应？保一个烈士遗属、革命领导干部，到底是“保皇”还是“造反”？文革后，我因“造反”而受害，无悔无怨。那是一股历史的潮流，当时谁不想跟着毛主席“造反”，谁不想当造反派表示革命！记得，“一·一二”夺权后，我的老领导王挺申请参加省委宣传部的战斗队，不被批准，他感叹说：“如今参加战斗队比当年入党还难啊！”诚然，造反派中确有坏人，造反派也有许多人干过错事、坏事，但绝不是全部。如今，把造反派妖魔化，搞得声名狼藉，这不是历史的真实。彭真在八十年代初站出来说过一句实话：“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号召造反，人们争当造反派有什么错！不要忘记历史。”习仲勋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人的看法要有辩证法的历史观点，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要看到人的变化。要科学的历史的分析。”

机关大院里爆炸声不断

在地下室关了三个多月，一九六八年元旦后把我放了出来。出来后，听说中央又召集山西核心小组成员赴京开会，再次解决山西问题，叫做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批评刘格平在七月会议以后，没有按照中央精神搞好两派的团结工作，而是支一派压一派，致使形势更加混乱。中央对山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让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参加核心小组并任第一副组长。

春节过后，又增加了支左部队。从北京军区调来一批支左干部，派到各大厂矿和大专院校。省委机关也派来了支左解放军。组长是老庞、老金等一共四个人。但是，山西的形势并没有稳定。武斗还是未停，大部分工厂都已经停产。

我从关押的地下室回家后，知道七一公社在所谓的毛主席“七一九”指示（要六十九军站在刘格平一边）以后，也有少数坚定分子并没有退却，更没有投降，而是继续坚持斗争。这时的领导人是从卫生厅借调到省委城市社教指挥部的张士俊。他们积极参加红联站的活动，在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纪念“九五”抗暴的游行活动中，张福祥扛着七一公社的大旗，行进在游行队伍中。杜玉斗、侯学录等始终没有动摇、屈服，一直坚持参加七一公社的活动。机关干部退出七一公社，也是因为毛主席“七一九”指示的压力，但内心并不服气，更不愿参加战到底兵团。在机关大院内以行政处的部分工人为主，成立了一个工人红旗战团，参加了刘灏为司令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工人红旗由张丑良领导，王镇海、米瑞林、刘东来、郭龙子等为骨干，机关干部乔映明、田中仁是高参。

自从认识张士俊以后，士俊就常常和我商量七一公社如何继续活动。在省委机关不便活动，就把活动地点定在了太原师范学校。这时与红联站的接触更多了些，七一公社的刘志英、张治德等也常来太原师范，我们一起在这里开会、议事。一九六八年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一九六八年“四九”指示（即林彪 1968 年 4 月 9 日与周恩来等接见六十九

军干部时的讲话，其中说到“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出笼后，中央又批评了支左解放军。要求支左解放军支持革命委员会。

红总站认为山西军区和六十九军对他们不支持，对军队一直持敌对态度。“四九”指示以后，红总站认为对他们有利，又在全太原市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并查封山西日报。就连省委机关大院也是爆炸声不断，“战到底”甚至把炸药包投向机关支左的解放军住处。威胁到老庞、老金等人的安全。

在武力严重威胁生命的情况下，该如何对付？要不要拿起武器？七一公社在太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太重“东风”的陈惠波，当时提出给我们两箱自制手枪。要还是不要？在会上我明确表明，中央三令五申反对武斗，我们决不能参加武斗。在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们可以躲避，这不是叛徒，也不是软蛋。因为两派斗争毕竟不是敌我斗争，躲避并不是变节行为。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没有要太重“东风”准备送给我们的手枪。

在运动后期公安部门收缴武器，以及在中央学习班审查是否私藏武器时，我十分轻松地说：“在文革中我连一个鞭炮都没有，别说枪支弹药了！”

文革中死的威胁随时都可能发生，住在省委机关大院的刘志英就曾被“战到底”抓走毒打过一次。为了保护刘志英，一九六八年在北京民族饭店举办的头头学习班，我就让他去参加了。后来，在石家庄又举办一次头头学习班，又让住在水塔院的侯廷元去参加了。当时来说，侯廷元获得了安全。但是，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725厂当厂长成绩突出，文化厅准备提拔时，却发现他参加过头头学习班，因此被卡了下来，失去了提拔的机会。其实侯廷元既不是社会上大组织的头头，也不是七一公社的头头。就是为了安全让他进了次学习班，结果给他后来的“官”路埋下了祸根，形成了一桩历史冤案。

从机关大联合到中央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九月，山西的形势又相对平静了一些。省委机关搞两派大联合。支左解放军做双方的工作，成立机关大联合总部，每派出三个代表。我们这一派推举了我、张丑良、乔映明。战到底兵团是栗宽景、和景春、李廷富。

大联合总部每天早上一上班，就“早请示”，站在毛主席像前，拿着《毛主席语录》挥舞着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天天如此。都觉得是搞形式，烦人，但谁也不敢吭声，不敢不做。

大联合总部啥事也干不成，其实也没什么正事可干。干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召开过一次批判大会，批判王谦、王大任、刘志兰。要我在大会上批判刘志兰，表示消除派性。

到了十一月，栗宽景偷偷地通过省革委办公厅副主任张友，废除了机关原来的财务章，。实际上是“战到底”夺了权。发现以后，我带领人马找张友说明白，让其改正。张友完全站在一派的立场上，拒不改变，斗了十几天也没有个结果，两派又因此对立起来。

那时，我白天、黑夜住在机关，刘东来等几个工人保卫我的安全。那时觉得天下没理，谁掌权谁就有理。社会上的群众组织互相斗，表面上看是红总站与兵团和红联站斗，实际上是核心小组刘格平、袁振、张日清之间博弈。当时，中央已把谢振华调到山西省军区任司令员。谢振华十分清楚山西的情况，但是时机不成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红总站仇视谢振华，利用陈永贵的派性给谢振华扣上反大寨的帽子。在昔阳的一次大会上，大寨的铁姑娘竟然在会上抢谢振华发言时的话筒，不让谢讲话，并公开批判谢振华表扬大寨“先公后私”，是反大寨。

我每天还得在机关上班，虽然是搞派性，可你是一派之主，不去还不行。老实讲，我当时对于两派无休止的纷争，实在烦透了，确实不想参加，但是身在“江湖”不由自主啊！

我想尽早摆脱这种费心劳神又烦又累的局面。于是想出一个理由和办法，与刘志英商量，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天，一起去找了谢振华司令员。我对谢司令员说：“中央在北京举办学习班，把两派斗争最厉害的太纺、机床厂、汽修厂、灯泡厂等单位的头头集中到了那里消除派性。省委机关干部是党几十年来培养和选拔的一部分优秀干部，将来党组织总是还要使用这批干部，省里应该把省委机关的干部选到中央举办的学习班，尽早消除派性，以备早日使用这批干部。”

谢司令员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春节过后不久，就决定省委机关选 350 名干部去北京学习。通知下达后，机关按照原来的单位确定进京学习的名额和人员。这项工作主要是支左解放军来完成。我仍算作四清办公室的干部，与四清政治部合在一起，编成一个班，共十四人。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刘贯文。在“一·一二”夺权以后，刘贯文作为二线的骨干，被打作“特务头子”抓起来，实行了军管。一九六八年机关实现大联合，我和四清办的同志商量，把刘贯文从监狱里救出来吧。我们很清楚，他不是什么“特务头子”，不过就是省委二线班子的一个工作人员。刘笃成几位同志同意我的意见，就开具证明从监狱把刘贯文保了出来。

刘贯文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很自傲的人。五十年代初从山西日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当了讲师，一九五七年反右几乎被打成右派。在人大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山西省委把他要回了山西，安排成省委办公室副主任，成为陶鲁笏的随身秀才。我力争赴京学习把他列入了 350 人名单中。这在其它部门根本是不可能的。

分配下放各奔前程

太原在“九大”以后，武斗再次升级，许多工厂被迫停产，连关系到全国经济和生活命脉的煤炭战线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中央对刘格平等人已经失去信任和耐心，不能听任山西动乱的局面再继续发展，于是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了针对山西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稳定形势的布告，并采取果断措施改组了山西核心小组，撤销了刘格平、袁振、张日清的职务，任命谢振华为核心小组组长，曹中南、陈永贵、李顺达、王体、韩英等人为核心小组成员。

谢振华在中央支持下，雷厉风行地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中央又增调六十三

军、二十八军协同原驻军六十九军一起收缴武器，解散武斗组织，抓捕武斗头头，拆除武斗工事。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中央又把山西省级机关八千多名干部全部调到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我们省委机关 350 名先期学习的人员，因为斗私批修、消除派性先走了一步，被作为骨干分配到省级各个机关，带动其他人消除派性。

到此，山西省委机关干部队伍已经解散，省委机关的文革造反运动也划上了一个句号。

学习班又在石家庄进行“清队”等教育共十个月，最后总结结束后，开始分配工作。省级机关已经撤销，中央和山西核心小组决定八千多学员分三大去向：大部分人是下放农村插队锻炼；部分是充实基层，到县里工作；只有少数人回省革委工作。

在“清队”中没有搞清历史问题的，要到忻定农场进行专案审查。另外，任井夫、王振国、张友、蒋健还有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丁磊、谷翠等留在河北，或者由中央另行分配。刘格平至此彻底告别了山西政坛。

中央还决定，凡是群众组织的头头担任过省革委委员的，要全部下放插队。我被分配到阳曲县辛庄插队。

七一公社负责人刘志英分配回省委组织部任处长，清查“四人帮”时，被关监狱四年，平反后任山西烟草公司总经理，直到离休，现已八十六岁，身体健康，安度晚年。另一负责人张治德分配回省直机关党委，清查“四人帮”时被关监狱，平反后到省交通厅任处长，清理“三种人”又被立案审查，没查出问题，调省高速公路局安置退休。另一负责人原家德，从学习班分配到省七二五印刷厂当副厂长，后又提拔为山西美术印刷厂厂长，已退休。

战到底兵团负责人和景春，分配回家乡新绛县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另一负责人张杰德分配回老家万荣县，也担任过宣传部门的领导，因不在省城，不知近况。主要负责人栗宽景，分配到榆次经纶厂当工人，后该厂破产，栗宽景跑生意没发了财，陷入困境。

在石家庄十个月的“五不准”学习班类似监狱的生活，我早就盼望着自由和解放。当学习班宣告结束，让回家的时候，欣喜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在山西省委机关三年文革的经历，饱尝“震中”的痛苦，记忆犹新，难忘“昨天”。

2013 年夏修改终稿于太原

【书海泛舟】

《虔诚的疯狂》题记与目录

孙 涛

按：这是孙涛所著《虔诚的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

沉浮纪实》一书自印征求意见本的题记与目录，页码是自印本上的页码。这部书稿作者还在广泛征求意见，依旧在修订中。

孙涛，汉族，中共党员，1947年2月生于太原，祖籍山西省平定县。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本科。曾任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通讯组组长、太原市文化局《并州文化》月刊社主编、太原市文联《城市文学》社主编、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太原市傅山学社副理事长、太原市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职称为国家一级作家。

（右图：孙涛近照。）



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驾崩，之后以华国锋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场历时十年的动乱才宣告结束。本书即将叙述的这段发生在山西的历史，以当时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的十年浮沉作为主线，结合作者多年来收集到的种种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作为铺陈内容，力求以真实作为基础，展示山西十年文革的全景。

不因尊者讳，不为贱者隐，尽力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是本书追求的纪实风格。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过来人去重温旧梦。真实地再现那个荒唐的岁月，是为了让如今没有亲临过那十年恶梦的年轻读者们，了解一下那个十年动乱的历史。这种了解可以是一种对逝去历史的猎奇，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思考。因为，任何对历史的思考，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真实了解之上。

——作者题记

目 录

序一：历史的责任和作家的良心 / 侯光天 / 9

序二：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 董大中 / 12

序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致孙涛兄 // 赵 瑜 / 14

尾 声 / 14

请读者不要奇怪，这部书确实是从尾声开始的。回眸山西十年文革，不仅是刘灏，恐怕众多的当事人，都会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第一章 / 21

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北京骤起的狂风刮进了山西。无论是党内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腔热血的大、中学生，都想积极投身那场伟大的革命。

- 【1】高三学生刘灏的理想 / 21
- 【2】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出世 / 24
- 【3】共同的紧跟心态 / 26
- 【4】毛泽东发动起亿万学生造反 / 30
- 【5】太原市两个动员大会 / 32
- 【6】点火会让刘灏明确了斗争大方向 / 35

第二章 / 39

刘灏为好朋友的父亲袁振翻案，带领众小将大闹太原市委大礼堂。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自个儿最终会自觉不自觉地绑到了袁振的战车上。

- 【1】十年间政治风水轮流转 / 39
- 【2】好朋友变成了狗崽子 / 41
- 【3】刘灏初识袁振 / 44
- 【4】刘灏赴京为袁振送申诉材料 / 47
- 【5】二上京城顺路搅了批斗王震的会场 / 51
- 【6】太原的官办红卫兵兴起 / 53
- 【7】且看省委对运动的态度 / 60
- 【8】袁振成功地策划了翻案 / 64
- 【9】用大字报“痛打卫恒黑帮” / 68

第三章 / 71

省城大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得不痛苦地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支持各路造反派起来革命造反。省委最初对手，竟是一群中学生。

- 【1】太原几大群众组织简述 / 71
- 【2】杨承孝与汤建中 / 78
- 【3】抢夺“黑材料” / 82
- 【4】炮打省委指挥部揪斗卫恒 / 86
- 【5】与卫恒的“革命谈判”有了结果 / 88

第四章 / 93

兵团的八项要求和卫恒的六条原则针锋相对。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搞好文化大革命，山西省委却被逼进了无法正常工作的困境。

- 【1】八项要求和六条原则 / 93
- 【2】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 / 96
- 【3】兵团战士与省委第一书记“拼刺刀” / 99
- 【4】五一广场再次揪斗卫恒 / 104
- 【5】省委一心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 106

第五章 / 109

毛泽东要发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刘格平等五名领导干部策划向山西省委夺权。“一·一二”夺权如一场地震，有些人震上天堂，有些人震入地狱。

- 【1】刘格平投书林彪与康生 / 109
- 【2】毛泽东支持篡改历史 / 114
- 【3】刘格平寻找同盟者密谋夺权 / 116
- 【4】毛泽东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118
- 【5】各路诸侯与五人大字报 / 123
- 【6】“一·一二”夺权（一） / 127
- 【7】当晚的一个插曲 / 132
- 【8】“一·一二”夺权（二） / 134
- 【9】山西省委全面溃败 / 141
- 【10】“一·一二”夺权（三） / 143
- 【11】《人民日报》当时的导向 / 150
- 【12】山西“一·一二”夺权何以能成功 /
- 【13】群众组织的不同命运 / 155
- 【14】袁振组建市革委 / 160
- 【15】卫恒的惨死 / 165
- 【16】刘格平组建省革委 / 168
- 【17】陈永贵杀下虎头山 / 175
- 【18】刘灏父亲的四条父训 / 180

第六章 / 183

兵团、红总站、红联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扑朔迷离的“四一四”事件，竟是几名中学生的率性所为。武斗初现，中央七月会议又助长了山西的派斗。

- 【1】丁磊组建起红总站 / 183
- 【2】红联站揭发杨承孝是狗崽子 / 185
- 【3】“三二六”报告和“四一四”决议 / 186
- 【4】“四一四”决议引发新混战 / 199
- 【5】刘司令指挥失灵 / 196
- 【6】老百姓总结的一句民谚 / 199
- 【7】红联站生擒杨承孝 / 202
- 【8】从两件事看刘灏的思维 / 203
- 【9】红联站和红总站都骂兵团是投机派 / 205
- 【10】康生收拾张日清 / 208
- 【11】刘灏扩军 / 212
- 【12】来历不明的最高指示 / 216
- 【13】兵团成了最大的赢家 / 223

第七章 / 226

刘格平为自己造神。山西的武斗不断升级。兵团俨然以政府口气下达通令，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显示出这些中学生们对领袖的一片虔诚。

- 【1】搞政治，你一定要记住两条 / 226
- 【2】《踏遍青山人未老》为刘格平造神 / 228
- 【3】红总站密谋拦截袁振 / 232
- 【4】大型武斗剪影之一：省委党校与山西大学 / 234
- 【5】大型武斗剪影之二：平遥古城 / 236
- 【6】大型武斗剪影之三：太原重机厂 / 241
- 【7】大型武斗剪影之四：山西机床厂 / 245
- 【8】大型武斗剪影之五：晋中和晋南 / 247
- 【9】大型武斗剪影之六：太原十中 / 248
- 【10】刘灏对“九五”事件的表态前后大转弯 / 256
- 【11】兵团以政府口气发布十项通告 / 262
- 【12】兵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265
- 【13】武斗继续发生 / 272
- 【14】康生翻脸收拾刘格平 / 276

第八章 / 281

毛泽东要把他的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69军登上了山西的政治舞台。所谓的斗批改和清队，造成了遍地冤狱。九大前后，杨承孝要与69军决一死战。

- 【1】兵团要与“丁氏东风政府”叫板 / 281
- 【2】北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 284
- 【3】1968年太钢大武斗 / 287
- 【4】毛泽东要用69军稳定山西 / 289
- 【5】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后山西的形势 / 293
- 【6】工宣队在大学的斑斑劣迹 / 295
- 【7】杨承孝的“一五”宣言 / 298
- 【8】迎芒果大会被搅散了 / 301
- 【9】九大前中央举办山西扩大的中办学习班 / 303

第九章 / 308

谢振华将军借“七二三”布告威力，杀一个，关一个，努力稳定了山西政局。山西的派头头们被囚在北京，革命的小将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 【1】中央发布了“七二三”布告 / 308
- 【2】谢振华下令杀一个、关一个 / 311
- 【3】革命小将成了革命对象 / 316

- 【4】赵树理的惨死 / 320
- 【5】运动的发展造成了遍地冤狱 / 325
- 【6】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331
- 【7】各种方式的上山下乡 / 334
- 【8】老劳模点拨刘司令 / 339
- 【9】机缘和选择 / 342
- 【10】十大召开和谢振华安排三大派组织领袖做官 / 346

第十章 / 351

穿上军装的江青炮轰谢振华，山西派斗烽烟再度燃起。山西的批邓被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推向了高潮。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

- 【1】江青炮轰谢振华 / 351
- 【2】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批谢（一） / 356
- 【3】“整理陈永贵黑材料”事件始末 / 359
- 【4】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批谢（二） / 366
- 【5】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 / 369
- 【6】邓小平的整顿和毛泽东的批邓 / 370
- 【7】周恩来逝世 / 373
- 【8】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 376
- 【9】红太阳最后的光芒 / 381
- 【10】王谦在山西掀起批邓高潮 / 385
- 【11】王谦在太原铁路局被揪斗 / 387
- 【12】毛泽东逝世 / 389

第十一章 / 391

王谦在山西“划大线、切西瓜”，山西又开始了充满派性斗争的清查扩大化。该如何反思文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命题。

- 【1】山西充满派性争斗的清查扩大化 / 391
- 【2】刘灏的一条“大罪状” / 399
- 【3】山西另列清查标准的一些原因 / 400
- 【4】刘梅校长大海般的胸怀 / 406
- 【5】历史延续的现实 / 408
- 【6】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 / 410
- 【7】让我们再读一些具体的数字 / 415
- 【8】难以承受的历史之重 / 417
- 【9】罪与罚的话题 / 422
- 【10】文化革命和文化复兴 / 431

文革之罪，罪在何人？回忆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吸取历史教训，而历史，首先应该真实地留给后人。

【书海泛舟】

《虔诚的疯狂》序 1：历史的责任和作家的良心

侯光天

孙涛同学：

《虔诚的疯狂》征求意见打印稿，从11月8日收到起，直到12月的月底，近两个月的时间，慢慢品味，细嚼慢咽，真是欲罢不能，欲速不能，边看边想，勾起了许多遐想和回忆。从文革开始至今43年，从文革结束至今33年，许多事许多人都已淡出记忆。仔细阅读此书，那些年代的人和事又都历历在目，不仅唤起了记忆，而且深化了认识，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可以概括为：不容易，很成功，有价值。

首先说不容易。文革十年，就山西而言，构成的大小事件不下万件，知名人物不下千人，将这么多的事和这么多的人梳理出一个头绪，并连贯成一部书，谈何容易？写这样一部涵盖山西十年文革历史的“巨著”，通常情况下，需要几人或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才能完成，但你却独力支撑，又采取马拉松式的方式，多人采访，多处征集，其信心和毅力为我辈树立了又一楷模。你已经创作过十多部长篇小说了，加上其他作品，早有二十余部作品行世，可以说著作等身，是文坛上业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了。再写这样一部书，没有了追逐名利之心，只为了体现出一份历史的责任和一颗作家的良心，实在值得嘉许。

其次说很成功。纪实文学的要旨是真实，不管你笔下如何生花，一旦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价值。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我作为山西十年文革的亲身经历者，读罢此书，没有感觉出一丝的虚假和作伪。尽管你用了文学语言，有的地方用了推断和理论解析，但都没有使文章失去真实性。贯穿全篇的刘灏这个人写得很生动，很传神，很成功。在文革中，他被错误的历史洪流卷向潮头，是典型的悲剧人物。正如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曾论述过的那种时代的“悲剧”，以及时代“悲剧”中产生的“悲剧英雄”。这样的“悲剧”和“悲剧英雄”，就因为他们无法跳出对各种现实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干预和积极追求的时代形式。原话记不太清了，但意思是这样。十年文革是我们党和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又因为它是我们党内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这种悲剧的“时代形式”，就更显得复杂。正如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有刘灏这种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充满虔诚感情的学生们，也有刘格平那种别有用心政治家，还有如杨承孝那类专搞武斗的造反派。这是真实的历史，你确实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我国清代诗人郭嵩焘有诗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前两句很像在说我，但整个四句都像在说刘灏。刘灏处在一个悲剧时代，是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的一个高中生，骨子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无比忠诚，以毛主席的教导和党中央机关报刊的社论精神参加文革。刘灏在被安排到太原古交庞庄插队前，是太原五中的革委会主任。除运动初期写过大字报外，他没有组织学生们批斗过老师和校领导，在师生中口碑很好。对五中的校园和设备保护得非常完好，基本上没有被损坏。他要紧跟领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他与刘格平和杨承孝们有本质的区别，但在那个年代，这种虔诚也必然造就了既属于时代，也属于他个人的悲剧。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有精神，对文革中参与造反的中学生，一律不予追究。然而在山西，当时的当政者却拿刘灏做了清算文革的替罪羊。但无论如何，刘灏作为一个在我国的特定历史阶段存在过的真实的历史悲剧人物，也将伴随着历史长河流传下去。

第三说有价值。当前长篇纪实文学固然不少，但像你这部闯入禁区的纪实文学还很罕见。它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史学价值，因为对文革的反思，必然要来源于痛苦的历史记忆。就这一点来说，我以为，它可以与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杨继绳的《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提并论。而且你视角独到立意高远，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如实地写出了这段历史，真是完成了一件抢救工程。你已经出版二十余部大著，它们都有其社会意义，但我坚信，此书更胜于它们，一定更会成为传世之作的。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已进入了历史垃圾箱。回望山西十年文革历史，按照当时的习惯认为，除了张志安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刘普德的山西红卫兵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保皇组织外，社会上的三大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红联站，没有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之区分，也没有所谓保皇和造反的分别，都是追随毛主席闹革命的群众组织。即使是保皇组织，也有保对保错的时候。因为你在拥护一批领导干部的同时，你又在打倒另一批领导干部，何况在打倒“刘邓司令部”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如今三大派的司令们刘灏、黄锐庵、段立生不仅都被定性处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成了好朋友。文革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眼里就是一场政治笑话。若干年后，定会有人在你这部书前吟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

光天草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

孙涛附记：我与侯光天先生都属文革中的老五届，他高我两级，文革在校时曾担任过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分管宣传。毕业后，在谢振华和王谦先后主政山西省委期间，又一直是省委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侯光天接替刘树岗担任昔阳县委书记，继续在昔阳县反思文革和纠正“农业学大寨”错误。之后在担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期间，因文革中的个人身份而失意官场。经征得他本人同意，将这封信作为序一。特附记说明。

【书海泛舟】

《虔诚的疯狂》序 2：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董大中

拜读孙涛兄大著《虔诚的疯狂》，是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那一段历史不堪回首，却又应该经常回首，经常反思，这才能够避免历史重演。

问题的要害在于个别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时，曾经提出一个哲学命题让大家讨论，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应该是历史创造英雄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中国，从五帝开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英雄在创造历史，在改变着、设计着、玩弄着历史应走的道路，而不是听命于客观。尧帝让贤，被传为佳话，但是，假如尧帝选择的接班人不是舜，而是一个表面君子、实为小人的人，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可能出现另一条途径。美国从开国起，就由全体居民选择自己的“治人者”。试比较两种办法，其结果昭然若揭。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可以归结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实现统一的时候，总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但如果出现的统一者是另一种性格的人物，秦始皇后期又不是赵高专权，秦朝会二世而亡吗？

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直没有为中国人所认识。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制度，制度就是“天子”的旨意，“天子”想怎么干，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就成了制度。欧洲却不是这样。那里也有黑暗，有中世纪，有僭主统治，有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那里的哲人们，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就在研究、就在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合理，比较能够体现平等。欧洲的僭主统治是被当作最专制的一种，但在中国封建君主们面前，欧洲最不好的僭主，权力也小得多。什么是中国特色？在社会制度上说，中国特色就是权力不受限制，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近 20 年来我在文化哲学上用的功夫比较多一些，写了一本书，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制度文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必须把它放在最最重要的地位。

大著所观照、所书写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例，但在世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以来，却是罕见的，对我们亲历者说，更是刻骨铭心的。越是荒唐的岁月越不应该忘记，它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由于过去许多年历次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遭殃，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已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变得短视、功利，只知蝇营狗苟，而不敢在有关人生道路上，在社会发展上，在国家制度上多思多想。有的人只会图解。有的自称看门狗。接到大著时，我眼睛一亮。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终于看到有心人了。20多年前，我开始光顾文物市场。我最先搜集的，是文革传单。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到年纪再大一点时，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唤起回忆，或者可以写个“亲历记”之类的东西，算是不辜负自己的时代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职责。看到大著，我真的感到佩服，感到兴奋。老兄走在前边了。

大著以一个人的遭遇为主线，把一个地区的文革全景摄入笔底，有广阔的背景，有清晰的线索，有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描写中心，点面结合，内外勾连，是一部具有史诗价值的纪实文学作品。刘灏，那是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从保袁振起家，中间经过站来站去“站队”的考验，最后被关进了监牢。人生如梦，刘灏就有如梦的人生，经过文革的人几乎都有如梦的人生。幸耶，不幸？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无论“拥军派”还是“反军派”，大家都是虔诚地拥护那具有“四个伟大”称号的神主，同一个目的却分成势不两立的不同派别的两大阵营，又合纵连横，所有的人被煮在一个锅里，搅来搅去，真正成了一锅稀粥，分不出你我。大著让我们回到了过去，看到了丑陋的自我。人是渺小的，自我丑陋不要紧，重要的在于时代太丑陋了。回顾历史，如何抛弃那个丑陋的时代，才是今天人们应有的清醒。

2010年9月24日

（董大中先生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作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出版《赵树理评传》等十余部专著。）

【书海泛舟】

《虔诚的疯狂》序3：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致孙涛兄

赵 瑜

孙涛兄如晤：

上月从府上归来，详读《虔诚的疯狂》书稿。反反复复，乃至竟夜。过去，我对晋东南地区文革诸事有一些了解，也完成了反映这一地区文革历史的《牺牲者》一书。而我对于省城文革的惨烈事态，却了解不深。红总站与兵团、红联站

分成两大派，残酷斗争，这是我长久以来的认识。而书中始终认为这是三大派系之间的鏖战，史迹斑斑，使我长思。也许，仁兄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兄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写了一系列省城文革风云人物的兴衰沉浮，这是极难得的开拓与挖掘。多年以来，国内文革研究成果本来就稀疏罕有，在仅有的少量著述中，又往往重事轻人，使得后来者看待文革，总是云里雾里，瞧不清庐山真面目，亦不知究竟是何种力量，推演民众文革巨潮翻滚。而轻视写人或者不敢于写人的结果，只能是连基本事件也说不清楚。因为任何全局性运动，无不是由具体人物来推进的。省城文革各大派头头，正是一批具体的历史人物。但是，像刘灏、宋杰、杨承孝、李青山、杨保明、段立生、郝庭云、黄锐庵、李大刚、方培泉、李金渭、马尚文、张志安、刘普德、高翔、王大壮、朱永成等这些当时声名显赫的当事人，却绝少被历史所研究所书写；还有从四面八方投身文革的众多骨干，像从北京来的朱永庚、邢晓光等大学生们，省委年轻干部李辅、丁磊，技术干部汤建中，工人张建国、陈冶秋等等，更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研究与重视。他们就像一块块优种试验良田，如不加以爱护，就不能掌握农事规律进而丰产。同理，不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便不能解释文革运动的主流向背，也就不能看清文革真相。推及全省、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道理。令人欣慰的是，我从《虔诚的疯狂》各个章节中，看到兄的笔下写出了近百名这样的重要代表，真令人开眼。也由此使我对省城文革内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批人物让我们进而想到：他们响应领袖号令，舍生忘死拼杀在文革第一线，本是时代产物，在当时看来则是社会先进因素，而后来的官学理论，却一律将他们划定为符号化恶魔式的造反派，斥责为一方土地上的动乱因素，这就构成了新的心灵冤案，远离了科学探索精神。可叹以上诸君，后半生大都挫折再三，历尽磨难，横灾不断。

从史实中看，文革之初，还有一批党政军官员，积极参与和主导了造反行动，他们更是造成天下大乱的重量级推手。翻开《虔诚的疯狂》一书，随处可见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何英才、陈守中、丁磊、刘志兰等要人们的频繁活动，还有像陈永贵那样从农村大队直冲峰巅的特殊人物。他们正是直接秉承最高层意图的造反夺权者，直接操纵了山西上下昔日政权的颠覆。而后来的文革官学，却不去探讨此类人物和现象，更不曾正视他们的作用和责任，事事都往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身上推，凡说文革浩劫，一律判定是红卫兵、造反派或者某些坏人搅动了祸水。无形的判决如此强蛮，无非是刻意转移责任。这不是对待文革历史的正确态度，这不公平。

文学作品写人更研究人，《虔诚的疯狂》正是抓住了这个重心，从历史人物本事出发，留给了读者一部真实的山西省城文革风云录。

无论怎样言说乃至争论，只要从科学纪实出发，写出了一种地缘真相，写出了文革运动一段史话，写出了当年那一代人精神心灵的荒诞和政治生活的悲怆，就算尽到了我们中年作家的职责。人们把作家当成有良知的群体，这个“人们”扩而大之，也可以视为人民，人民希望作家说真话，希望作家写好书，希望作家

讲人话，希望作家擎举着真理火炬，引领读者前行。孙涛吾兄不辞劳苦，积多年之辛劳，呕心沥血，精撰此著，为山西作家群体做了一个榜样。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话说得清醒。可叹自文革终结以来，统治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文革这件事，而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能忘记这件事。

看一看我们作家群落，几十年来，许多人放弃了知识分子使命，或被政治强权所奴役，或被经济利益所绑架，或被某种官职所陶醉，或被伪劣宣讲所欺瞒，却昏昏然不自知，不自醒，自身变做了无骨软体动物，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现实。而被奴役者，自我矛盾重重，内心痛苦不堪，绝无欢欣可言。那么，与其痛苦余生，何不振臂书写？写出一部真文字，诉诸后人，留给历史，挥洒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写照呢？很遗憾，作家群落中不少人，宁把魂灵出让给庸俗，也没有兄的冷峻与醒悟。

我们究竟在寻找着什么？我们仅仅是在寻找文革史实吗？不，从深层需求上看，我们是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话语。实质上，我们是在寻找着一个文化人真实的人生。我们从内心深处始终拒绝：被现实的大海将自身毁灭。

关于书中的一些内容，我尚有话想说，然而这不是一篇短文能容纳的。很多话题可以留待我们烟茶之间慢慢道来。比如民众为什么响应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兴衰，部分干部的造反，群众组织的结构，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丧失经济自主权的民众对参与运动的抉择，大乱年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九大以后“官府文革”现象，军队政权与造反派系的交叉，1976年以后的文革余波等等；还有，怎样看待两派剧烈厮杀的武斗问题，怎样分辨林彪与江青两大阵营的问题，怎样认识周恩来历史作用问题，怎样廓清文革分期问题乃至文革起源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安下心来，一一破解。当然，我们几个作家，干不了多少大事，我们只能就一个省份、一段史实来尽力做些探索，局限性还是很大。这就需要我们能同全国作家和文革研究者包括国际文革研究者多加联系，多做交流，共同完成寻求真知的过程。

最后一件事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写了此类探索文革的著作，能否在短期内于国内出版问世呢？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我和我的《牺牲者》。时间一长，我也想明白了：首先，我们做了一件作家该做的事，短期内能否出版，则是第二位的；孙涛兄完功这部书稿，我为之庆幸。至为忧惜者莫过于半途而废。《虔诚的疯狂》写完了，即得到大的胜利。无论短期内是否能出版，都不会影响她应有的价值。古往今来，大浪淘沙，曾经的巨量出版物也不见得留存后世，而古人写了好书，那时没有出版社，也可以流传至今，禁都禁不住，惟其价值界定为最终标准；再者，我不大热衷于将书稿放在境外出版，那样很难出口转内销，广大中国读者才是我们终身为之劳作的对象；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纸媒书籍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传播与阅读方式，网络等新渠道的兴起，力量极大，是可以利用的。总之，我不相信长久的黑暗，我只相信历史的规律和挡不住的光明。

做文学常常是孤独的。而孙涛兄并不孤单，你的写作和业绩，自会被清醒的

国人和真挚的同仁所看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总有肩负重任的同道前行。我相信，后来者以及下一代人，必将珍重你对文革的泣泪书写。当前的庸俗与低迷，只是暂时现象。让一些政治家继续他们的“遗忘与愚弄”吧。

不久前在北京时，一位作家朋友戏说：如果没有一两部出版不了的书，那还算中国的好作家吗？仔细一想，斯言有益。我只有再次表示钦佩并祝贺你的劳作。咱们一点都不着急。

孙涛吾兄，下次相聚，我们的话题将更加详尽具体，真乃大乐趣也。

春天来了，望兄保重身体，新年吉祥。

致以

文学工作的崇高敬礼！

2013 年除夕夜南华门稗史斋

（赵瑜先生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中长篇纪实文学近三十部。曾三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大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孙涛附言：本书三篇序言，都是作者读罢本书征求意见稿后的感言，都有真知灼见，我按其写作时间排列为序，特此说明。并向三位朋友再次致谢。

【文摘】

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

孙 涛

按：本篇节录自作者所著《虔诚的疯狂》一书征求意见稿第十一章第6节。

山西十年文革的历史已经叙述完了，至于刘灏的结局，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叙述。

现在，让我们改变一下话题。当中国的十年文革已成历史之后，这段历史正在集体的遗忘过程中，被固化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红卫兵、造反派和走资派这样一些政治概念。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甚至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把走资派全部塑造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无论是当初被官方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十年后被官方媒体称为“十年动乱”或者“十年浩劫”的文革，在它的发展和走向中，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是混乱的，所依靠和所打击的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山西，这种变化，足可成为全国的一种缩影。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

从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10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北京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歧，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还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编审阎长贵在《陶铸是被谁打倒的》一文中（此文刊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披露了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指导全国运动的一些批示，特转摘如下：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央向首都一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所谓右派。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西省委先揪出了“袁振反党集团”，向太原市派出了工作组，向各大学派出了观察员，又公开批判副省长王中青，公开批判作家赵树理，对一些下级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办法，如对山西大学主持党委工作的刘梅、宋华青，以及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李雪明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在省委支持下，各级党委组建起官办红卫兵，这批以血统论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父辈掌握着党政军的大权，当他们扮演起文革主力军的角色时，自认为是在继承着父辈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使命。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横扫四旧，在文化界教育界揪斗“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在社会上不断制造着红色恐怖。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各界人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历史上在旧政权里做过事的，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右派分子，宗教人士等等，全成了横扫对象。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

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

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夺取省委大权这一阶段，文革的主力军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他们以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造反动机，将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和各级党委。发起成立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刘灏、郭红、李生全等；发起成立太原六中32111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等；发起成立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李大纲、方培泉、侯光天、王守仁等；发起成立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杨保明等；发起成立省委党校东方红兵团的赵奋田、段立生等；他们在运动初期几乎都是挨过整的学生。他们与血统论武装起来的官办红卫兵不同，不热衷于横扫四旧，揪斗文化界教育界的“反动

权威”和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牛鬼蛇神”。他们革命造反斗争矛头所指，是省委和各级党政部门中的“走资派”。后来，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学生们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相结合，成为引领文革的主流。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就是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

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

从1967年元月的夺权风暴开始，到1969年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刘格平为代表的进入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各级武装部支左的军队干部，还有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全省的派系队伍，形成了混乱的派战。各地“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支持不同的派性组织，已经不再是被专政的“走资派”，而是成了被一派拥戴，被另一派打倒的人物。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视自己为文革动力，视对立面组织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混战中，双方都认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人都可能朝为英雄，晚为囚徒。“拥军派”在地方武装部的支持下，多数时期占上风。当这种混战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武斗后，两派中的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四、由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

“七二三”《布告》前后，军队支左，全面掌控了山西政局。这是山西文革中一段较长的时期，由谢振华开始主政，到江青炮轰谢振华为止。从山西的高层政局看，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当年的官办红卫兵和后来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不得不远离了文革的主流，成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社会上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小头头们，也大都成了“学习班”斗私批修的对象。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全省许多“走资派”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随着“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文革的受害群体依旧在扩大着。69军派出的一些干部，各地区、各县的武装部支左人员，在选择依靠对象时，以“支左”为标准，对以前支持张日清和各级军分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往往另眼相看，有的干脆站在一派立场上去整另一派。原先虽然也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但并没有出任过主要头头的许多政工干部们，这时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类专案组的主力。知识分子依旧是革命的对象。其他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则更加广泛。文革初期受到官办红卫兵专政的“牛鬼蛇神”们，再次成为清理对象；参与武斗的群众组织骨干们，特别是反对过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们；新挖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各种阶级敌人们；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历史上有些政治污点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求生计而做了点小买卖的所谓投机倒把分子……门类众多，难以一一计数。

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之后，以王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为标志，军队干部全面退出政坛，地方干部重新在全省掌权。批谢运动中，要批“谢曹路线”和“肃清谢振华流毒”，一批谢振华主政时使用的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陈永贵成了山西的太上皇，“反大寨”成了一种罪名，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随时会被戴上“反

大寨”的帽子，成为阶下囚。直到结束文革后的清查运动，王谦一个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又使全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成了被清查和被专政的对象。曾被陈永贵挥舞着“反大寨”的鞭子批斗过多次的王谦，此时却紧跟成为中央首长的陈永贵，接过了“反大寨”的鞭子，狠狠地抽向了别人。

无休止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山西文革的这五个阶段。构成革命动力的人员变化着，变成革命对象的人员也变化着，共同之处是：全没有刑法依据，没有司法监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山西的十年文革，就是这样过来的。目及全国，大致情形不也是这样吗？

开始文革，是中央全会的决定，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和靠边站了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还有周恩来，他们都是对这种决定举手同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几乎全都疯狂地、虔诚地参与了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文革从上到下，到处轰轰烈烈，到处势如破竹，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研究十年文革历史，必须将业已被固化的历史还原为当初的原生态，后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十年文革的演变过程，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十年文革何以能成为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

当我重新穿越那十年的历史时，看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从最初的卫恒、王谦、王大任，到取而代之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再到由支左战线而走上省委主要领导岗位的谢振华，最后到批林批孔时代执掌了山西党政大权的陈永贵和王谦，这一任又一任党的高级干部们，在那十年光景中，又有谁不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高喊着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努力地、自觉地、不敢有所怀疑地紧跟着毛主席和当时的党中央，按照领袖毛主席的上述种种错误理论和观点，领导进行那场名为革命、实为浩劫的大运动呢？他们的这种自觉性，与当时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刘灏、段立生、黄锐庵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许许多多年轻学生、年轻干部，年轻工人们心中的自觉性，都是对伟大领袖的虔诚迷信，都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失去独立思考的一种盲从，归根到底，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在中共党内和国民心中留下的病态。遇罗克和张志新式的人物，有，但属个例而非主流。在呈病态的主流中，当遇罗克被枪决、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时，全国各地一级又一级的党组织中，无论被造反夺权还是后来重建之后，又有哪一级党的组织，在那十年历史中间，讨论过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政治灾难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报刊和广播，在那十年历史中间，又有哪一家不是用错误的舆论导向，天天教育和推动着全国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呢？还有中国特定政体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们，在那十年间，又有谁家以反对文革的意见参政和议政了呢？组成执政党的广大中共党员们，组成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们，面对文革中的一排排浊浪，为什么没有筑起一道摧不垮的堤坝，还当时中国一个清平世界呢？特别具有反讽味道的，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向各地党政负责人大讲特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时，一次次用个人迷信之伟力，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不断地夺取所谓文革的伟大胜利时，他自己和全党的

各级领导们，大约都没有想到，走上神坛的领袖，在变成已经践踏了民主，正以个人意志统领全党和全民走上错误道路的现代终身制君主之后，全党和全民又该怎么办？

如皇帝般的领袖终身制，必然不要宪法，不要民主，不要监督。文革中的那种“大民主”，只是毛泽东发动民众打倒政治对手时的一种手段，他绝不容许那种“大民主”对准他所推行的文革。在这种专制操纵下的“大民主”运动中，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胆敢为刘少奇说话者，便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推而广之，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因而犯了弥天大罪，要向毛主席请罪；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只因对毛泽东的错误做了一点批评，对文革做了些反思，就被判处死刑，1975年4月4日被处死，临刑前，还割断她的喉管，不让她呼口号。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当毛泽东后来用军队推进他的文革时，他最早赋予学生和民众的那种“大民主”，已经被他收回去了。再往后，他在病榻上下令打倒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民主运动残酷镇压，更是他对民众大民主的真实态度。

不要民主和监督，必然会形成专制。而专制的保证，则是必须让全党和全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推行愚民政策，强化个人迷信，领袖可以为所欲为，执政的共产党缺失了人民的监督，党内的监督部门和社会上的参政议政党形同虚设。十年文革的教训，难道不是这样吗？

【编读往来】

李正权对上期何蜀文章的一处质疑与何蜀的答复

李正权对上期何蜀《重庆大武斗中的“第三条道路”》文中写到《战恶风》小报创刊号“发表了呼吁两派‘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的社论”提出质疑，认为“斗私批修”这段语录及有关提法是在1967年国庆节后才流行的，而《战恶风》创刊号按文中所说是在此前的8月8号出刊的，有没有可能在那篇社论中就出现“斗私批修”的说法？

何蜀答复如下：“斗私批修”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在其1967年7月至9月“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中出现的，具体这一指示是在何时何地最先讲的，何时传出的，尚不清楚。我手里没有《战恶风》创刊号，是通过电话询问一位文革小报收藏家后，听他介绍了他所登记的各小报创刊号各版文章要目了解到的（他也没有该小报原件，是从别处看到的），要明确该期小报上是否出现了“斗私批修”的提法，只有待查到该小报后才能确定。

忻鼎亮来信谈何朴

读了《昨天》2012第八期董国强教授的“南京文革研究专辑”，感到文章很

好，只是董教授在文中好几次提到何朴，并说他是“作为中央文革秘密特使前往南京活动”，这一说法不准确。现将我所知道的何朴的情况提供如下。

何朴是我校（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在 1968-1969 年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关押在校专政队。在参加修京原铁路劳动期间，交我们班（6451 班）监督看管，参加劳动和接受群众批判。他当时具体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冒充中央文革进行政治行骗；二是反军乱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与中央文革实际上没什么关系。我们当时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军区领导都会相信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所以曾多次追问他，是否有中央文革下属部门或个人与他有联系或给过他一些指令？他坚称都没有，只说初见面时，因他口气很大，有人问他是否中央文革派来的，他以不答表示默认，后来就这样假戏真做了。我相信他那时说的是真的，因为王、关、戚早已倒台，他完全可借此推卸部分责任，更何况冒充的罪名相对更重。不知何老师如今是否还健在，他如果愿意写些回忆，南京文革的史料将会更充实。

2013 年 7 月 2 日